

中國近代史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戰火、變革與新生
揭示中國現代化的
起源與歷程。

蔣廷黻 著

近代中國史研究的
開山之作！

從思想變革到對外戰爭，
探討近代中國的關鍵轉折，
看見中國在動盪中如何與列強互動，
塑造全新的現代中國。



中國近代史

戰火、變革與新生，揭示中國現代化的起源與歷程

蔣廷黻 著

大旗出版社 出版

出版緣起

本書作者蔣廷黻先生早年赴美求學，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在學術界以其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的深刻見解而嶄露頭角，也在中國歷史學界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學者。而在政治方面，蔣廷黻先生歷任中研院院士、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他更是中華民國歷任最久的聯合國大使，為「中華民國」在當時持續保有聯合國席次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美國知名漢學專家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表示：「在你（蔣廷黻）從政以後，現代中國毫無疑問地失去了最有能力的歷史家，……然而，即使如此，我知道作為史家的你，會有史家的視野來意識到你傑出的貢獻，這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

《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先生贈送給中華民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之一，基於對作者的尊重，本書特別將過往版本因政治環境考量而刪除的部分重新載入，也希望藉此讓國人對於近代中國能有更多面向的認識。

蔣廷黻先生在本書中以「我們」、「我國」所代稱的「中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已經取代大清帝國之法統的「中華民國」，為了尊重歷史事實與本書作者對於自身國家的認同，編輯部忠實完整保留此概念與用法。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事實真相只有親歷者才知道」。近年因為國際情勢與東亞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化，許多在現代仍可考的歷史觀念正在被系統性地竄改與抹滅，透過還原歷史，讓廣大讀者充分瞭解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脈絡，這是大旗出版編輯部決定復刻出版本書的初衷。

大旗出版．大都會文化 編輯部 敬啟

總論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已外族久已有了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滿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裡，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打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裡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完備，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我國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洋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裡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年起始用機械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

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過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餘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作一個頭等的國家，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也可以把俄國作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家，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臺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即莫斯科，下同）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下同）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的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史達林，下同）還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卻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的長進，土耳其則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我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

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已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致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畫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基瑪爾，於是始得復興。基瑪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國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第一章

「近代中國」的概念

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原故是很複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彝士運河（即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原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的，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安南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我們，許他們作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作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

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賣鞋子的，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滿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的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收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人的態度就慢慢的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裡。在廣州的外人之中，英國已佔領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的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

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作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一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侯（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她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英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的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回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的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趨的人力物力，只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第二節 英國人作鴉片買賣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只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裡想法子加增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乃獎勵種植，統制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加增。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輸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班紳士覺得煙禁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面加重關

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俱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摺，大聲疾呼的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摺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的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裡，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惟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加嚴禁止，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煙禁。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前沒有辦過「夷務」，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

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我國士大夫階級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干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節 東西對打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一個星期的考慮和佈置，他就動手了。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出賣的鴉片「盡數繳官」；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甘願「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麼禮義廉恥，實在還不是要價？價錢講好了，買賣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的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把行裡的中國人都撤出，然後禁止一切的出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國人的監牢，並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裡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他們在裡面當然要受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濟，義律原想妥協，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面只有兩個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國的鴉片。

義律共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一網打盡。這是林則徐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了。他批林的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大財了。林在虎門海灘挑成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啟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讚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

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後，靜待政府的訓令。林則徐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並且朝廷調他去做兩江總督，他可是不去。他說：已到的鴉片，既已銷毀，但是以後還可以來。他要徹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結，以後不作鴉片買賣；這個義律不答應，於是雙方又起衝突了。林自覺極有把握。他說，英國的戰鬥力亦不過如此，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門的炮臺都重修過。虎門口他又拿很大的鐵鍊封鎖起來。他又想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他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間，廣東水師與英國二隻小兵船有好幾次的衝突，林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是樂觀的。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以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 率領海陸軍隊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 (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夏天到廣東洋面。倘若英國深知中國的國情，懿律應該在廣州與林則徐決勝負，因為林是主戰派的領袖。但英國人的策略並不在此，懿律在廣東，並不進攻，僅宣佈封鎖海口。中國人的解釋是英國怕林則徐。封鎖以後，懿律北上，派兵佔領定海。定海並無軍備，中國人覺得這是不武之勝。以後懿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艦隊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清廷憤懣極了。道光下令調陝、甘、雲、貴、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國腳慌手忙。上面要調兵，下面就請餉。道光帝最怕花錢，於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諭罵林則徐道：「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隸總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國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調查英國軍備，覺得英人的船堅炮利遠在中國之上。他國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炮位之下，「沒有石磨盤，中具機軸，只須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回想中國的設備，他覺得可笑極了。山海關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強蒸洗備用」。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為外人所據，「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他決計撫夷。

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書很使琦善覺得他的撫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書的前半都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殘暴武斷，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琦善拿中國人的眼光來判斷那封書，覺得它是個狀紙。林則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們伸冤。他就將計就計，告訴英國人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體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

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於賠款一層，中國多少會給一點，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國。至於變更通商制度，他告訴英國人，事情解決以後，英人可照舊通商，用不著變更。懿律和義律原不願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應了琦善回到廣州去交涉，並表示願撤退在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於是下令教內地各省的軍隊概歸原防，「以節糜費」。同時革林則徐的職，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廣東以後，他發現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國人堅持賠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為與其割地，不如加開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應，所以只好慢慢講價，稽延時日。英人不耐煩，遂於十二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後，琦善遂和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予英國，以後給與英國平等待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迷不悟，革職鎖拿，家產查抄入宮，同時調大兵赴粵剿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另派代表及軍隊來華。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主戰，彼此絕不交涉。英國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戰。道光也是很倔強的：一軍敗了，再調一軍。中國兵士有未出戰而先逃者，也有戰敗而寧死不降不逃者。將帥有戰前妄自誇大而臨戰即後退者，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如關天培、裕謙、海齡諸人。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諱言。人民有些甘作漢奸，有些為饑寒所迫，投入英軍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再抵抗，於是接受英國要求，成立《南京條約》。

第四節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

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拚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為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起始維新呢？此中原故雖極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

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裡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覲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作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開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

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要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併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兩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第五，英國人在中國者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來。

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為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那裡。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的載於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前廣東地方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爭原因之一，現在把關稅明文規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段新的稅則平均到百分之五，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微高一點。負責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後海關的收入比以前還要多，所以他們洋洋得意，以為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遺害不少。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為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

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為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則徐為領袖，後者以琦善為領袖。戰爭失敗以後，撫夷派當然得勢了。這一派在朝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後，美法兩國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我國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來作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查出。這樣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國人，勢必與英國人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以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並且伊里布、耆英諸人以為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佔，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中國並無妨礙，中國何不作個順水人情？英國為避免別國的妒嫉，早已聲明她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第六節 剿夷派又抬頭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的多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後，惟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少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仇視。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爭以前，因為中外通商集中於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大財的機會。《南京條約》以後，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戰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江西，過梅

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後，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並不經過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

仇外心理的表現之一就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民出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知道這種仇殺一定要引起大禍，所以竭力防禦，絕不寬容。他嚴厲的執行國法，殺人者處死，這樣一來，士大夫罵他是洋奴。他們說：官民應該一致對外，那可以壓迫國民以順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廣東的地位，一天困難一天。

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城的問題。照常識看來，許外國人到廣州城裡去似乎是無關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廣州城裡去似乎也沒任何損失，可是這個入城問題竟成了和戰問題。在上海，就全無這種糾紛。

《南京條約》以後，外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上海城內租借民房，後來他們感覺城內街道狹小，衛生情形也不好，於是請求在城外劃一段地作為私人居留地區。上海道台也感覺華洋雜處，不便管理，乃劃洋涇濱以北的小塊地作為外人住宅區。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廣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鴉片戰爭以前，外人是不能入城的。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為神聖之地，外夷倘進去，就好像與尊嚴有損。外人也是爭意氣：他們以為不許他們入城，就是看不起他們。耆英費盡苦心調停外人與廣州人民之間，不料雙方愈鬧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許於二年後准外人入城，希望在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當時人民攻擊耆英者多，於是道光調他入京，而升廣東巡撫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態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給民情，以羈縻辦夷務，方為不負委任。」

徐廣縉升任總督以後，就寫信問林則徐馭夷之法。林回答說：「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諭和林則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階級傳統的高調和空談。僅以民心對外人的炮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麼國際關係？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都是政治家的失敗。徐廣縉也是怕清議的指責，也是把自己的名譽看的重，國事看的輕。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比徐廣縉更頑固。他們繼承了林則徐的衣鉢，他們上臺就是剿夷派的抬頭。

道光二十九年，兩年後許入城的約到了期。英人根據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大夫和民眾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疑，後亦無可奈何，只好順從民意。葉名琛自始即堅決反對履行條約。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眾。英人這時不願為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的舉動。徐葉認為這是他們的大勝利，事後他們報告北京說：

「計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雇募。公司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眾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警猾夷。」

為紀念勝利，道光帝賞了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

爵，世襲花翎。道光又特降諭旨，嘉勉廣州民眾：

「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年初道光死了，咸豐即位。在咸豐年間，國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戰，對外則剿夷派的勢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個御史曹履泰上奏說：

「查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養疾，使此日英夷頑梗不化，應請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陛見後，令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未復原，亦可養嗣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風而靡，伎倆悉無所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

咸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教林來京。林的運氣真好：他病太重，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譽藉此保存了。

第七節 剿夷派崩潰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去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責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面，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閩、粵四省的海岸，現在他們要深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他們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於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

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也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回廣東去找葉名琛。他們後來到天津，地方當局只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為減免各種稅收，其餘一概拒絕。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葉名琛派兵登香港註冊之亞羅船上去搜海盜，這一舉給了英國人開戰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教士馬神父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處理，又得罪了法國。於是英法聯軍來和我們算總帳。

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後來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即加爾各答）。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眾不但不抵抗，且幫助英國人把藩台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與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

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納到上海，名為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為達到這個目的，清廷準備出很大的代價。只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開通商口岸，清廷願意以後全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佈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事極認真。

九年，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並在大沽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帶相當海軍。到了大沽口，看見海河已堵塞，他們憤憤不平，責中國失信，並派船拔取防禦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炮臺出其不意同時開炮。英法的船隻竟無法抵抗。陸戰隊陷於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只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

咸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游局勢之危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口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陸路進北京。我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復，要雪恥。他們只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面進攻大沽炮臺，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英法代表要求率衛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們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訢留守北京。奕訢是咸豐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八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

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咸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作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公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奕訢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後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定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喪失一寸土地。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和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係更要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訢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為福，只要我們大膽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沒有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復她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前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滿清有計劃的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年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只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

那時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學

增加生產。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歎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為大亂。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迴圈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污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為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那一種沒有官吏作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裡，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裡。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更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迴圈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

和珅。據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獠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還是明目張膽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禦史常大淳上奏說：

「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眾斂錢。遇歲歉，白晝夥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群，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維繫力。我們一面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層的。

第二節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上一節所講的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即西曆一八一三年。傳說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家境窮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到十六歲才輟學，作鄉村教師。這樣似乎他不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下層，他自己並不是個勞力者。他兩次到廣州去考秀才，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心懷怨恨。這是舊社會常有的事，並不出奇。洪秀全經驗的特別是在廣州應試的時候，得著耶穌教傳教士的宣傳品。後來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自說與耶穌教義符合，於是信仰上帝，創立上帝會。最早的同志是馮雲山，也是一位因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他們因為在廣東傳教不順利，所以遷移其活動於廣西桂平縣。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運動都帶點宗教性質，西洋中古的時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與基督教發生關係，不過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穌教也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稱耶和華為天父，耶穌為天兄，自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華上帝者，「無災無難」；不崇拜者，「蛇虎傷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戰場，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術。孔廟及寺觀都必須破壞。

洪秀全的上帝會吸收了許多三合會的分子。這個三合會是排滿的秘密團體，大概是明末清初時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收了三合會的會員以後，他的運動以推倒清朝為第一目的。他罵滿人為妖人。滿人之改變中國衣冠和淫亂中國女子（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汙；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是洪秀全的宣傳品斥責的最好的對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以外，他有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他提倡男女平權，但他的宮庭充滿了妃妾，太平天國的王侯將帥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詔書中有田畝制度，其根本思想類似共產主義：「有田共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義，雖有詳細的規定，並未實行。是他不願實行呢？還是感覺實行的困難而不願試呢？就現在我們所有的史料判斷，我們可以說洪秀全對於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是十分積極的，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黨徒除馮雲山以外，尚有燒炭的楊秀清，後封東王；耕種山地的蕭朝貴，後封西王；曾捐監生與衙門胥吏為伍的韋昌輝，後封北王，及富豪石達開，後稱翼王。他的運動當然是個民間運動，反映當時的民間痛苦和迷信，以及潛伏於民間的種族觀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縣（舊名永安），於是定國號為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兵進圍永安。洪秀全於咸豐二年春突圍，進攻桂林，未得，改圖湖南。他在長沙遇著很堅強

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攻。他在岳州得著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搶奪了不少的帆船。實力補充了以後，他直逼武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春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後，他才開始他的建國工作。

從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到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可說是太平天國的順利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對洪秀全的運動是怎樣應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國民不分貧富，是守中立的。太平軍到了，他們順從太平軍，貢獻金錢；官軍到了，他們又順從官軍，又貢獻金錢。他們是順民，其實他們是左右為難的。他們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絕無好感，因為他們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夠了。並且官軍的紀律不好，在這期內，太平軍的紀律還比較好一點。同時老百姓感覺太平軍是造亂分子，使他們不能繼續過他們的平安日子？太平軍到處破壞廟宇，毀滅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心中不以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他們幹他們的事，對於官軍及太平軍無所偏倚。有組織的秘密會社則附和太平軍，如湖南的哥老會及上海的小刀會。大多數士大夫階級，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於排滿一層，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但是他們一則因為洪秀全雖為漢人，雖提倡種族革命，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滿人雖是外族，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二則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隨便作亂，亂是容易的，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所以士大夫階級，這時對於種族革命並不熱心。

太平軍的軍事何以在這時期內這樣順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點。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為它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氣，能拼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

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餉額甚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但是綠營在制度上也有一種好處。這種軍隊雖極端腐化，然是統一的國家的軍隊，不是個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光和咸豐以前，地方大吏沒有人敢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國內亂的意外副產品，以後我們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節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生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他雖沒有下過苦力，他的教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成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爭將要開始的時候。他的日記雖提及鴉片戰爭，他似乎不大注意，不瞭解那次戰爭的歷史意義。他仍埋首於古籍中。他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和小農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只有汗水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豐初年曾國藩官作到侍郎，等於現在的各部次長。他的知己固然承認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數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業起始的時候，他的聲望並不高，他也沒有政治勢力作他的後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階級確承認他的領袖地位。他對洪秀全的態度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

那時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所以人民為自衛計，都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這種武力，因為沒有官場化，又因為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係，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它成為一個軍隊。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但是為什麼惟獨湘軍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我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他的「討賊檄文」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此：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裡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

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裡，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層資格。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這是他的特別的第三點。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於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於大炮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舊文化，而那個舊社會舊文化所產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標準，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的一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去籌餉。以後他成了大事，並不是因為清廷和官僚自動的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著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著他們給他個作事的機會和權利。

第四節 洪秀全失敗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後，我們更能看出他的真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他深居宮中。務求享作皇帝的福，對於政事則不放在心上。宮廷的建築，宮女的徵選，金銀的聚斂，官制宮制的規定，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後來簡直變為瘋狂的迷信。楊秀清向他報告國事的困難，他回答說：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

快要滅亡的時候，南京絕糧，洪秀全令人民飲露充饑，說露是天食。

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復興民族，且不能作為部下團結的中心。在咸豐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內訌。東王楊秀清個人獨掌大權。其他各王都須受東王的節制。照太平天國的儀式，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八千歲，餘遞減。別的王都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並須跪呼千歲。在上奏天王的時候，東王立在陛下，其餘則跪在陛下，因此楊秀清就為其同輩所憤恨。同時天主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韋昌輝設計誘殺楊秀清和他的親屬黨羽。翼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屬殺了。天王為聯絡翼王起見，下令殺北王，但翼王以後還是獨樹一幟，與天王脫離關係。經過此次的內訌，太平天國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滅。以後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則因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聲援，二則因為他得了兩個後起的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別人都失敗了，然後重用曾國藩，任他為兩江總督，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事。湖北巡撫胡林翼是與他志同道合的，竭力與他合作。他的親弟曾國荃是個打硬仗的前線指揮。以後曾國藩舉薦他的門生李鴻章作江蘇巡撫，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撫。長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於是得通盤籌畫。他對於洪秀全採取大包圍的戰略。同時英、美、法三國也給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幫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軍在曾國荃領導之下打進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復漢族的自由，這當然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的是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為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清朝，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清朝並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的誠實的研究清朝在嘉慶、道光、咸豐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它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嘗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道、咸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興的氣象。第三，他怕清朝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繞環著，長期的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清朝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復我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他的不健全的地方，

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曾國藩的革命事業，我們留在下一章討論。他的守舊事業，我們在前一節裡，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要指出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只好催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的認識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咸豐十年，擔任京津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只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先所想像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占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為所欲為，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他們於是買外國軍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強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他膽敢出來與外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復了首都。時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咸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們的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游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即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可見輪船給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慶找了幾位明數理的舊學者和鐵匠木匠去試造輪船，造成了以後不能行動。左在杭州作了同樣的試驗，得同樣的結果，足證這般人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

在長江下游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上海與外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Gordon）統帶的長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寫給恭親王和文祥說：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

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制器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懾，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李鴻章第一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的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改革前清的科舉制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為李鴻章認識時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作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

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麼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第二節 步步向前進

自強的事業頗多，我先擇其要者列表於下。

- ▼ 咸豐十一年恭親王及文祥聘請外國軍官訓練新軍於天津。
- ▼ 同年，恭親王和文祥設立同文館於北京。是為中國新學的起始。
- ▼ 同年，恭親王和文祥托總稅司赫德（Robert Hart）購買炮艦，聘請英國海軍人員來華創設新水師。
- ▼ 同治二年李鴻章設外國語文學校於上海。
- ▼ 同治四年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 ▼ 同治五年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校。
- ▼ 同治九年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 ▼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赴美國留學。
- ▼ 同年，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 ▼ 光緒元年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 ▼ 光緒二年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陸軍，船政學生赴英、法學習造船和駕船。
- ▼ 光緒六年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道。
- ▼ 光緒七年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 ▼ 光緒八年李鴻章築旅順軍港，創辦上海機器制布廠。
- ▼ 光緒十一年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 ▼ 光緒十三年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

以上全盤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故軍事建設最多。但我們如仔細研究就知道國防的近代化牽連甚多。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兩個機械製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分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術人材去駕使，所以設立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築。第四，新式的國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幾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制布廠來挽回利權，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定一個建設計畫。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收效。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須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第三節 前進遇著阻礙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為什麼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不要徹底，大部分因為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過外國。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敗以後，他已年過七十，他的建設事業已經過去了。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

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瞭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業作例子。

李鴻章自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起始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為當時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對付外人，又因為他比較勇於任事，而且他的淮軍是全國最近代化最得力的軍隊，所以從同治九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國防的建設全在他手裡。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國能戰勝日本海軍，無論日本陸軍如何強，不能進攻高麗，更不能為害中國。那麼，李鴻章辦海軍第一個困難是經費。經費所以困難就是因為中國當時的財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費，只好靠各省協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能按期十足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室用錢，漫無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後，沒有繼嗣，於是西太后選了一個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而實權還不是在西太后手裡。等到光緒快要成年親政的時候，光緒和他的父親醇親王奕譞怕西太后不願意把政權交出來，醇親王定計重修頤和園，一則以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后沉於遊樂就不干政了。重修頤和園的經費很大，無法籌備，醇親王乃請李鴻章設法。李氏不敢得罪醇親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設海軍的款子移作重修頤和園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戰以前的七年，中國海軍沒有添訂過一隻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這種事情是不能發生的。

在李鴻章所主持之機關中，並沒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審計制度。就是在極廉潔極嚴謹的領袖之下，沒有良好的制度，貪污尚且無法杜絕，

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手的款項既多，發財的機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並且子彈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狼狽為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

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失敗的原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作海軍的總教官，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只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佔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實在是因為戰略戰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為路線錯了，是因為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只建築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親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作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炮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是要自己製造，非有科學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習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的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回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後，竭其禱昧，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

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為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在雲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為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回國了。回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作事，只好隱

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作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一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回伊犁，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國的時候抱定志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卻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作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鬥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的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裡，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份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

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在同治、光緒年間，民眾的守舊雖在士大夫階級之上，但是民眾是被動的，領導權統治權是在士大夫階級手裡。不幸，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完全不瞭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同治共十三年，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這個時期內，德意志統一了，義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後，隨著就是國內的大建設和經濟的大發展，等到國內的經濟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圖向國外發展。在同治以前，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加了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並且在同治以前，英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英國的製造品。同治以後，德、美、法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我國在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

道光、咸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志士應該人人瞭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國內的資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兩國資本很多，資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資本家能把資本投在中國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達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但是接受外國來的資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國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的建設大部分是利用英國資本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固然得了好處，但是美國開闢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鐵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我們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為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孫中山先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他贊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收益。所以我們對於外國的資本應採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築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係是商業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大部分還是平等國家間之

貿易，不是帝國與屬地之間的貿易。英國與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大於英國與其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最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必說了。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完全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多。日本及義大利是最窮的。棉、煤、鐵、油四種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麼，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雖然，資本主義不一定要行帝國主義而後始能得到原料。同時，出賣原料者不一定是受壓迫者。譬如：美國的出口貨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國、義大利從美國輸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國主義，因為美國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銷。

總之，資本主義可變為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為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為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還在遊牧時代，無資本也無工業，但是他們對我的侵略，還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滿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亞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瞭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

只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捻匪，陝、甘、新疆有回亂，清廷令左宗棠帶湘軍去收復西北。俄國趁我內亂的機會就佔領了伊犁。這是俄國趁火打劫的慣技。在十九世紀，俄國佔領我們的土地最多。咸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佔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里。現在俄國的阿莫爾省及濱海省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佔領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的說，她全無領土野心，他只代表我們保守伊犁，等到我們平定回亂的時候。他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俄國預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回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國不但可以併吞伊犁，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把伊犁作為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於俄國意料之外，還出於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陝西甘肅收復了。到了光緒元年，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之中，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營新疆呢？並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複雜，面積浩大，成敗似乎毫無把握。於是發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進攻。他說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若新疆不保，陝甘就不能保，陝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的相反。李說自從乾隆年間中國佔領新疆以後，中國沒有得著絲毫的好處，徒費駐防的兵費。這是實在的情形。他又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為沿海的省分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在東方的過於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於西洋各

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於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邊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勢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屬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李是低調。士大夫階級一貫的尚感情，唱高調，當然擁護左宗棠。於是借外債，移用各省的建設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運氣真好。因為新疆發生了內訌，並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為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犁的退還。崇厚所定的條約雖收復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險要區亦割讓。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利，如新疆加設俄國領事館，經甘肅陝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權。士大夫階級主張殺崇厚，廢約，並備戰。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竟為所動。於是腳慌手忙，調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那裡有這麼多軍隊呢？首當其衝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願打仗。第二，俄國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開到日本洋面。中國因此又必須於沿海沿長江設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兩漢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為憤慨。可是抗戰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作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必須作三件事：一、遷都於西安。二、長期抗戰至少十年；三、滿人預備放棄政

權，因為在長期戰爭之中。清政權一定不能維持。清廷聽了戈登的意見以後，乃決心求和。我國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劇才因此沒有開演。

幸而俄國在光緒三四年的時候，正與土耳其打仗，與英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所以不願多事。又幸而中國當時有青年外交家曾紀澤，以極冷靜的頭腦和極堅強的意志，去貫徹他的主張。原來崇厚所訂的條約並沒有華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紀澤運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權利及土地，但償價加倍，共九百萬盧布。英國駐俄大使稱讚曾紀澤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回她已佔領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關於伊犁的衝突告一段落的時候，中法關於越南的衝突就起了。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策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

「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幅員廣辟，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山河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攻了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英法聯軍直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為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他們作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人既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蘇聯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強的壓迫，內有反革命的抗戰，列寧（Lenin）於是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

法國進攻越南的時候，士大夫階級大半主張以武力援助越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昂。李鴻章則反對。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籌備腹地的國防事業。清廷一方面怕清議的批評，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戰爭，所以舉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濟越南軍費和軍器，後來果然引起中法戰爭。那個時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談兵。北京乃派主戰派的激烈分子張佩綸去守福州船廠。陳寶琛去幫辦兩江的防務。用不著說，紙上談兵的先生們是不濟事的。法國海軍進攻船廠的時候，張佩綸逃得頂快了。陳寶琛在兩江不但無補實際，連議論也不發了。打了不久就講和，和議剛成又打，再後還是接受法國的條件。越南沒有保存，我們的國防力量反大受了損失。左宗棠苦心創辦的福州船廠就在此時被法國毀了。

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國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

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高麗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裡，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顯應攝政。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傳教士，他堅決不與外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關係，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對馬島之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謀出路。光緒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俱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他們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抵抗。

森有禮與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們始終堅持高麗是我們的屬國：如日本侵略高麗，那就是對中國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高麗不負任何責任，就沒有權利。

黑田與井上在高麗的交涉成功。他們所訂的條約承認高麗是獨立自

主的國家。這就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而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高麗雖都把條文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統觀念所誤。照中國傳統觀念，只要高麗承認中國為宗主，那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高麗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曾未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曾未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末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為日本一縣。中國當然反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的好，因為這正是中俄爭伊犁的時候。中國無法，只好把琉球作為一個懸案。

可是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高麗。琉球或可不爭，高麗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專意籌畫如何保存高麗。光緒五六年的時候，中國可以說初次有個高麗政策。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只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高麗的權利愈多，他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高麗要人李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

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

經過三年的勸勉與運動，高麗才接受這種新政。光緒八年春，由中國介紹，高麗與英、美、德、法訂通商條約。

高麗不幸忽於此時發生內亂。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李顯應一面反對新政，一面忌王后閔氏家族當權。他於光緒八年六月忽然鼓動兵變，圍攻日本使館，誅戮閔族要人。李鴻章的謀士薛福成建議中國火速派兵進高麗，平定內亂，一則以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以防日本。中國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高麗京城。吳長慶的部下有兩位青年，張謇和袁世凱。他們膽子很大，高麗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於是他們把大院君首先執送天津，然後派兵佔領漢城險要，幾點鐘的功夫，就把李顯應的軍隊打散了。吳長慶這時實際作高麗的主人翁了。後高麗許給日本賠款並許日本使館保留衛隊。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在高麗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八年夏初之季，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起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滅高麗。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臺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預備向日本宣戰。張佩綸說：

「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複封建，繼則欲改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為幣，雖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以扶桑一艦為冠，固已鐵蝕木腐，不耐風濤，餘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國定遠鐵船、超勇、揚威遠甚，問其兵數，則陸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始雜募遊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陣，大半惶怯，又去中國淮湘各軍遠甚。」

鄧承修也是這樣說：

「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萬兩。窘迫如此，何以為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敗，陸軍內分六鎮，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舉非精銳。然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

這兩位自命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一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為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複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義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

「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財，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

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大辯論終了之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事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高麗的黨政軍正成對壘之陣。一面有開化黨，其領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諸人，其後盾即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上黨，領袖即金允植、閔泳翊、尹泰駿諸人，後盾是袁世凱。這一派是聯華的，想托庇於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和袁世凱代練的高麗軍在一面，對面有日本使館的衛隊及日本軍官所練的高麗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抬頭，既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那能顧高麗？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設宴請外交團及高麗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後忽報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埋伏兵士所殺。洪英植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的手裡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佈獨立，派開化黨的人組閣。

十月十九日，袁世凱帶他所練的高麗兵及中國駐防漢城的軍隊進宮。中日兩方就在高麗王宮裡開戰了。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都到袁世凱手裡。洪英植、樸泳孝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著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全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這時候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的陰謀。難怪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駐高麗的總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過了他政府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對高麗，亦以和平交涉對中國。光緒十一年春，伊藤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駐高麗的軍隊，但高麗以後如有內亂，中日皆得調兵進高麗。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俄兩國因為阿富汗的問題，幾至開戰。他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為預防俄國海軍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南下，忽然佔領高麗南邊之巨磨島。俄國遂謀佔領高麗東北的永興灣。高麗人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裡，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他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裡，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所以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我們，李鴻章與袁世凱遂大行其積極政策。

從光緒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國對高麗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他們第一緊緊的把握高麗的財政，高麗想借外債，他們竭力阻止。高麗財政絕無辦法的時候，他們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給高麗。高麗的海關，是由中國海關派員代為管理，簡直可說是中國海關的支部。高麗的電報局是中國電報局的技術人員用中國的材料代為設立，代為管理的。高麗派公使到外國去，須先得中國的同意，到了外國以後，高麗的公使必須遵守三種條件：

「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不拘定。」

「遇有朝會公宴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之後。」

「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

這種政策雖提高了中國在高麗的地位，但與光緒五年李鴻章最初所定的高麗政策絕對相反。最初李要高麗多與西洋各國往來，想借西洋的通商和傳教的權利來抵制日本的領土野心。此時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國獨佔高麗。到了光緒十八九年，日本感覺中國在高麗的權利膨脹過甚，又想與中國對抗。中國既獨佔高麗的權利，到了危急的時候，當然只有中國獨當其沖。

甲午戰爭直接的起因又是高麗的內亂。光緒二十年（即甲午西曆一八九四年）高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眾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藉口保衛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本派兵甚多，遠超保僑所需之數。李鴻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東學黨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但是內亂平定之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根在內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不答應，因為這就是中日共管高麗。

這時日本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先發制人。士大夫覺得高麗絕不可失，因為失高麗就無法保東北。他們以為日本國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擋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鴻章則覺得一調大兵，則雙方勢成騎虎，終致欲罷不能。但他對於外交又不讓步。他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國公使喀西尼

（Cassini）答應了他，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李覺得既有俄國的援助，不必對日本讓步。殊不知喀西尼雖願意給我援助，俄國政府不願意。原來和戰的大問題，不是一個公使所能負責決定的。等到李鴻章發現喀西尼的話不能兌現，中日外交路線已經

斷了，戰事已經起始了。

中日兩國同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九月十七）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值得我們研究。那時我國的海軍力比日本海軍大。我們的占世界海軍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兩個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各七千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的船比我們快，船上的炮比我們多，而且放的快。我們的船太參差不齊，日本的配合比較合用。所以從物質上說來，兩國海軍實相差不遠。那一次我們失敗的原故很多。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Tyler）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因為船上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準備幫丁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懂中文，兩人只好比手勢交談。不久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泰樂爾亦受輕傷。日本炮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日人

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

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訂《馬關和約》。中國承允高麗獨立，割臺灣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要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

第四章

社會和思想狀況

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甲午戰爭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後，李鴻章用各種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國的援助，但都失敗了。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衝突就成為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於打算盤的。西洋各國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在甲午以前，沒有積極推動，一則因為他們忙於瓜分非洲；二則因為他們互相牽制各不相下；三則因為在遠東尚有中國與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他們的援助，他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且愈願意出代價。同時他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裡，中日戰爭，無論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他們反可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聯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在內。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財政部長威特（Witte）正趕修西比利亞鐵路，他發現東邊的一段，如繞黑龍江的北岸，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如橫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時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國能得大連、旅順，俄國在遠東就能有完善的軍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亞鐵路及得一個不凍冰的海口；這是威特想要乘機而達到的目的。法國當時聯俄以對德，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家想乘機向遠東發展呢？德國的算盤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國，一則可以使俄國知道德國是俄國的朋友，俄國不必聯絡法國；二則俄國如向遠東發展，在歐洲不會多事，德國正好順風推舟；三則德國也可以向我們索取援助的代價。這是三國干涉《馬關和約》實在的動機。

俄、德、法三國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馬關條約》發表以後，他們就向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他們願助中國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們那時痛恨日本的情緒之下，這種友誼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們希望三國能把臺灣及遼東都替我們收回來。同時三國給與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之佔領遼東半島不利於遠東和平。戰後之日本固不敢不依從三國的勸告，於是退還遼東，但加賠款三千萬兩。中國覺得遼東半島不止值三千萬兩，所以我們覺得應感激三國的援助。

《馬關條約》原定賠款二萬萬兩，現在又加三千萬兩，中國當然不能負擔。威特一口答應幫我從法、俄銀行借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率之低，誠使我們受寵若驚。俄國真可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行加冕典禮。帝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該派頭等大員去作代表，才算是給朋友面子。中國乃派李鴻章為慶賀加冕大使。這位東方的畢士麥克（即俾斯麥）於是到歐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國的心理，所以他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首言日本之可惡可怕，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的進攻既然順利，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俄國本想參戰，但因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給予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使俄國修條鐵路橫貫東三省。李鴻章並未駁辯威特的理論，但主張在中國境內之鐵路段，應由中國自修，威特告以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修，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威特最後說，如中國堅拒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再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定密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中許俄國建築中東鐵路。

光緒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並無於短期內再進攻中國的企圖。是時日本政府反轉過來想聯絡中國。因為西洋倘在中國勢力太大，是於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

是要援助中國，是要利用中東鐵路來侵略中國的。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這些國難都是那個密約引出來的。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路過德、法、比、英、美諸國，他在柏林的時候，德國政府試探向他要代索遼東的報酬，他沒有答應。德國公使以後又在北京試探，北京也沒有答應。光緒二十三年秋，山東曹州殺了兩個傳教士，德國乘機一面派兵佔領青島，一面要想租借膠州灣及青島及在山東修鐵路和開礦的權。中國於二十四年春答應了。山東就算是德國的利益範圍。

俄國看見德國占了便宜，於是調兵船佔旅順、大連。俄國說為維持華北的勢力均衡，並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順、大連，並且還要修南滿鐵路。中國也只好答應。我們費三千萬贖回來的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又奪去了。俄國還說，他是中國惟一的朋友！俄國的外交最陰險：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以後他在東北既有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及大連、旅順，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於是英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及長江流域的優越權利。法國要求租廣州灣及廣東、廣西、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要求福建的優越權利。義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門灣。除義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國都答應了。這就是所謂瓜分。惟獨美國沒有提出要求，但他運用外交，使各國不完全割據各國所劃定的範圍，使各國承認各國在中國境內都有平等的通商權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

這種瓜分運動就是甲午的敗仗引起來的。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第二節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看見我國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打敗了以後又要割地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作的僅

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中國的經史，我們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使正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了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為就是這時代中的這樣的人。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縣人，生在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孫中山先生大十一歲。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給他的教訓，除預備他能應考試，取科名外，特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外國去過。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淵泉。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康有為所能得的僅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我們已經說過，同光時代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限於物質方面，是很不徹底的。後來梁啟超批評他說：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這種批評是很對的。可是李鴻章的物質改革已遭時人的反對，倘再進一步的改革政治態度，時人一定不容許他。甲午以後，康有為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為要提倡。這就是所謂變

法運動。

我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只有兩個人曾主張變法，一個是王莽，一個是王安石。兩個都失敗了。王莽尤其成為千古的罪人。所以沒有敢談變法。士大夫階級都以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為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義在《公羊傳》裡可以看出來。《公羊傳》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法制並無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

《公羊傳》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專制政體對亂世，立憲政體對升平之世，共和政體對太平之世。康有為這本書的作用無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鎮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

康有為在甲午年中了舉人，乙未年成了進士。他是那個國難時期的新貴。他就趁機會組織學會，發行報紙來宣傳，一時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數並不瞭解他的學說，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體方案，只有極少數可以說是他的忠實同志。但是他的運動盛極一時，好像全國輿論是擁護他的。

孔子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舊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為的實際政治工作是從抓住皇帝下手。他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之中，一再上書給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光緒也受了時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國。他先研究康有為的著作，後召見康有為。他很賞識他，因為種種的困難，只教他在總理衙門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變法派和光緒帝。於是他又派康有為的四位同志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在軍機處辦事。從戊戌四月二十三日 to 八月初康有為輔助光緒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天之內，康有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緊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後政府的考試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經濟的策

論。換句話說，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第二，調整行政機構。康有為裁汰了許多無用的衙門和官職，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總督同城的巡撫，不治河的河督，不運糧的糧道，不管鹽的鹽道。同時他添了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我們現在的經濟部，想要推行經濟建設。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居大多數。為什麼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的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裡面，升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為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

康有為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裡。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時想索性廢光緒皇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洩露他們的機密。西太后先發制人，把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複由太后臨朝訓政。康有為逃了，別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后及頑固黨。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為、梁啟超，逃難海外，又得著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頑固黨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后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作皇帝。剛毅、崇綺、徐桐、啟秀諸頑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這是因為他們也是愛國分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為頑固分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后複政以後，她硬不割讓三門灣給義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後義大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占地，還傳教。這一層尤其招頑固分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教是聖教，洋人的宗教是異端，是邪教，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順君師，洋人是無父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禦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鏟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分子以為可以靠民眾。利用民眾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分子覺得這個義和團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匪並無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教士為物件，民眾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外國傳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教徒與非教徒的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藥丹，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痛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

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教堂、鐵路、電線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炮打不死他們。山東巡撫李秉衡及毓賢前後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擾亂起來。

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當作亂民，派兵痛剿。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后，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了。西太后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為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拳匪之亂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西太后乃於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同時宣戰。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都攻不破。同時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於是西太后同光緒帝逃到西安。李鴻章又出來收拾時局。

拳匪之亂的結束是《辛丑合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辛丑合約》有三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餘萬兩。俄國的部分最多，（那時中俄尚是聯盟國）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國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國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國占百分之十一強，日本與美國各占百分之七強。第二，各國得自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線駐兵。近來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合約》。第三，劃定並擴大北京的使館區，且由各國留兵北京以保禦使館。

這種條款，夠嚴重了。但我們所受的損失最大的還不是《辛丑合

約》的各款。此外還有東三省的問題。庚子年，俄國趁拳亂派兵佔領全東北三省。《辛丑合約》訂了以後，俄國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假使中國接受了俄國的要求，東北三省在那個時候就要名存實亡了。張之洞、袁世凱竭力反對接受俄國的條款，日本、英國、美國從旁贊助他們。李鴻章主張接受俄國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東北三省就要在他手裡送給俄國了。日本、英國看見形勢不好，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年初，締結同盟條約來對付俄國。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亦贊助同盟。京師大學堂（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中國加入同盟，變為中日英三國的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情形不利於他，乃與中國訂約，分三期撤退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條約雖簽字了，俄國以後又中途變計。日本乃出來與俄國交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兩國交涉失敗，就在我們的國土上打起仗來了。

那一次的日俄戰爭，倘若是俄國全勝了，不但我們的東三省，連高麗都要變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倘若日本徹底的打勝了俄國，那高麗和東北就要變成日本的範圍，中國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實上日本只局部的打勝了，結果兩國講和的條約仍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不過劃北滿為俄國鐵路及其他經濟事業的範圍，南滿包括大連、旅順在內，為日本的範圍。這樣，日俄形成對峙之勢，中國得收些漁人之利。

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回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這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

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的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徹底的實行。為什麼不徹底呢？一則因為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徹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國。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西太后甘心作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偉大與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八六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親耕種，十三歲，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裡進了教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回到廣州入博濟醫學校。次年，他轉入香港英國

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裡讀書共十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文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瞭解為什麼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光緒十年的中法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所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行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為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泄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入館，秘密的把他拘禁起來，想運送回國。幸而得著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拳匪作亂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搖動了許多人對滿清的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的

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贊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詞》裡面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各養成其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眾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十九世紀，西洋人雖已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為歐美在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學和工業為全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內部又滿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理想嗎？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豫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的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的宣言的下半

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瞭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說過：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汗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汗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梁啟超是康有為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清朝，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裡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為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啟超說，在閉關自守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啟超的學說是對的。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訓政。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

第五節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庚子拳匪之亂以後，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這種觀察是很有根據的。甲午以前，因為西太后要重修頤和園，我國海軍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軍艦。甲午以後，一則因為西太后與光緒帝爭權，二則因為滿清的親貴以為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滿人失權，西太后和親貴就煽動全國一切的反動勢力來打倒新政。

我們固不能說，滿人都是守舊的，漢人都是維新的，因為漢人之中，思想腐舊的也大有人在。事實上，滿人居領袖地位，他們一言一動的影響大，而他們中間守舊的成份實在居大多數。並且他們反對維新就是籍以排漢，所以庚子以後，滿清雖逐漸推行新政，漢人始終不心服他們，不認他們是有誠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在西安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以後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內，她裁汰了好幾個無用的衙門，廢科舉、設學校、練新兵、派學生出洋、許滿漢通婚。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日本勝了俄國以後，時人都覺得是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制。於是在乙巳年（一九〇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表示要預備立憲。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調整時期。

丙午（一九〇六年）九月，釐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機關有內閣、軍機處、六部、九卿。所謂九卿多年是無用的衙門。六部採用委員制，每部有滿漢尚書各一，滿漢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並且道咸以後，各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軍機處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機關，原是內閣分出來的一個委員會，實際補佐皇帝處理大歧的。自軍機處在雍正年間成立以後，內閣變成一種裝飾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軍機處，此外設立十一部，每部以一個尚書為最高長官。這種改革雖不圓滿，比舊制實在最好多了。但十一名尚書發表以後，漢人只佔五人，比以先六部滿漢各一的比例還差了。所以這種改革不但未和緩漢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運動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〇七年）滿清決定設資政院於北京，作為中央的民意機關，設諮議局於各省，作為地方的民意機關。戊申年，滿清頒布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為預備立憲時期。如果真要立憲，九年的預備實在還不夠，但是因為當時國人對滿清全不信任，放反對九年的預備，說滿清不

過藉預備之名以擱置立憲。

滿清在這幾年之內，不但借改革以收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統繼位，其父載灃作攝政王的時候，第一條命令是罷免袁世凱。此時漢人之中尚忠於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凱要算是第一。載灃還要得罪他，這不是滿清自取滅亡嗎？

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滿人的把戲，積極的圖以武力推倒滿清的政權。丙午年，同盟會的會員蔡紹南，劉道一聯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會黨在瀏陽和萍鄉起事。他們的宣言明說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滿清，建設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同盟會成立以後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義初次充當革命的目標。不幸失敗了。同時還有許多革命黨員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軍之中運動革命，清廷簡直是防不勝防。

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中山先生乃領導胡漢民汪精衛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中心。他們在丁未年好幾次在潮州、惠州、欽州、廉州、及鎮南關各處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歸失敗。同時江浙人士所組織的光復會也極活動。丁未年五月光復會首領徐錫麟殺安徽巡撫恩銘。此事牽連了他的同志秋瑾。兩人終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帶安徽新軍的一部份突攻安慶。他雖失敗了，他的行動表示長江一帶的新軍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

丁未、戊申兩年既受了這多挫折，同盟會的多數領袖主張革命策略應該變更。胡漢民當時說過：「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汪精衛反對此說。他相信革命志士固應有恆德「担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身，百折不撓，以行其志」，但是有些應該有烈德，「猛向前進，一往不反，流血以溉同種」。他和黃復生秘密的進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後事不成，被捕下獄。這是庚戌宣統二年的事情。

汪精衛獨行其烈德的時候，中山先生和胡漢民、黃興、趙聲正在南

洋向華僑募捐，想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向滿清進攻。這是汪精衛所謂恆德。他們於庚戌年十一月在檳榔嶼定計劃，先佔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田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定了計劃以後，他們分途歸國。次年，辛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們的計劃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功，因為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的腦際。

正在這個時候，清廷宣布鐵路國有的計劃，給了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機會。那時待修的鐵路以粵漢，川漢兩路為最急迫。困難在資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諸省的人民乃組織民營鐵路公司，想集民股築路。其實民間的資本不夠，公司的領袖人物也有假公濟私的，所以成績不好，進行很慢。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乃奏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線都收歸國有。借外債來建設本是一種開明的政策；鐵路國有也是不可非議的。不過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已喪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種原故，鐵路國有的問題就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黨又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的導火線。

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但自黃花岡失敗以後，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為革命策源地。他們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特別注重長江中游之兩湖。那時湖北新軍中的蔣翊武組織文學計於武昌，藉以推動革命。在湖南活動的焦達豐及在湖北活動的孫武和居正另外組織共進會。這兩個團體雖有同盟會的會員參加，並不是同盟會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間頗有磨擦。經譚人鳳調和以後，共進會和文學社始合作。

同盟會的首領原來想在長江一帶應該有好幾年的預備工作，然後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爭路的風潮擴大以後，他們就決定辛亥年（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發難的日期原定舊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十天。確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

破獲，黨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倉卒之間定八月十九日，即陽歷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衙門。總督瑞澂當即不抵抗出逃，新軍統制張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棄城逃走。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據。革命份子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軍的都督。

武昌起義以後，一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劇烈的戰爭。滿清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選派代表，製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老古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

滿清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這種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是不能生效的。袁世凱替清室謀得的不過是退位以後的優待條件，為自己確得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滿清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各種障礙面對面了。

第六節 軍閥割據十五年

民國元年的民國有民國必須具備的條件嗎？當然沒有。在上了軌道的國家，政黨的爭權絕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內戰。軍隊是國家的，不是私人的。軍隊總服從政府，不問主政者是屬於那一黨派。但是民國初年，在我們這裡，軍權就是政權。辛亥的秋天，清室請袁世凱出來主持大政，正因為當時全國最精的北洋軍隊是忠於袁世凱的。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所以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也與這個原故有關。我們以先說過在太平天國以前，我國並沒有私有的軍隊，有之從湘軍起。湘

軍的組織和精神傳給了淮軍，淮軍又傳給北洋軍，以致流毒於民國。不過湘軍和淮軍都隨著他們的領袖盡忠於清朝，所以沒有引起內亂。到了民國，沒有皇帝了，北洋軍就轉而盡忠於袁世凱。

為什麼民國初年的軍隊不盡忠於民國，不擁護民國的憲法呢？我們老百姓的國民程度是很低的。他們當兵原來不是要保禦國家，是要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的。如不加以訓練，他們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於國家和忠於主義，只知道小忠，忠於給他們衣食的官長，和忠於他們同鄉或同族的領袖。野心家知道我國人民鄉族觀念之深，從而利用之以達到他們的割據企圖。

工商界及學界的人何以不起來反對軍閥呢？他們在專制政體下作了幾千年的順民，不知道什麼是民權，忽然要他們起來作國家的主人翁，好像一個不會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濤之中去游泳，勢非淹死不可，知識階級的人好像應該能作新國民的模範，其實也不盡然。第一，他們的知識都偏於文字方面。古書愈讀的多，思想就愈腐舊，愈糊塗。留學生分散到各國各校各學派，回國以後，他們把萬國的學說都帶回來了，五花八門，彼此爭辯，於是軍閥的割據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國的讀書人，素以作官為惟一的出路。民國以來，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小朝廷愈多，他們作官的機會就愈多。所以知識階級不但不能制止軍閥，有的時候，反助桀為虐。

那麼，我們在民國初年絕對沒有方法引國家上軌道嗎？有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朝不是中國復興惟一的障礙。其他如國民程度之低劣，國民經濟之困難，軍隊之缺乏主義認識，這些他都顧慮到了。所以他把建國的程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但是時人不信他，因為他們不瞭解他的思想。他們以為清朝是我們惟一的障礙，清朝掃除了，中國就可以從幾千年的專制一躍而達到憲政。這樣，他們正替軍閥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是古人所謂「欲速則不達」。在民國初年，不但一般人不瞭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

會的會員，瞭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並沒有健全的革命黨作他的後盾。至於革命軍更談不到。當時軍隊的政治認識僅限於排滿一點，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習慣，只夠作反動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沒有健全的革命黨和健全的革命軍幫他推動他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決然讓位與袁世凱，一方面希望袁世凱能不為大惡，同時他自己以在野的資格，努力造黨和建設。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著帝國主義壓迫的空前大難關，以一個曹操、司馬懿之流的袁世凱當國主，樹立一個新朝代，那我們也可馬虎下去了。但是我們在二十世紀，所需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袁世凱絕不是個這樣的人。他不過是我國舊環境產生的一個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內，他借了一批大外債，用暗殺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敵宋教仁，擴充了北洋軍隊的勢力，與日本訂了民國四年的條約，最後聽了一群小人的話，幻想稱帝。等到他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時候，他沒有做一件於國有益，於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後，靠利祿結合的北洋軍隊當然四分五裂了。大小軍閥，遍地皆是。他們混打了十年。他們都是些小袁世凱。到了民國十五年的夏季，中國的政治地圖分割到什麼樣子呢？第一，東北四省和河北、山東屬於北洋軍閥奉系的巨頭張作霖。他在北京自稱大元帥，算是中華民國的元首。第二，長江下游的江、浙、皖、閩、贛五省是北洋軍閥直系孫傳芳的勢力範圍。孫氏原來是吳佩孚的部下，不過到了民國十五年，孫氏已羽翼豐滿，不再居吳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屬於直系巨頭曹錕為總統的吳佩孚。第四，山西仍屬於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獨立而專事地方建設之閻錫山。第五，西北算是吳佩孚的舊部下而傾向革命之馮玉祥的勢力範圍。第六，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屬於一群內不能統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軍閥。第七，廣東、廣西、湖南三省是革命軍的策源地。

從元年到十五年，我們這個國家的演化達到了這種田地。

第七節 蔣總裁貫徹總理的遺教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並下達動員令。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們雖有革命志士，但沒有健全的，有紀律的，篤信主義的政黨；前此我們雖有軍隊參加革命，但沒有革命軍。此後就大不同了。我們如要瞭解民國十五年北伐誓師為什麼是個劃時代的史實，我們必須補述孫中山先生末年的奮鬥。

我們已經說過，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佈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過程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用不著說，軍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對封建勢力的掃蕩和肅清，訓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黨猛進的締造憲政所必須的物質及精神條件。民國初年，這樣的革命軍和革命黨都不存在，軍閥得乘機而起，陷民國於長期的內亂，人民所受的痛苦，反過於在清朝專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於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對的。民國三年，他制定革命黨黨章的時候，他把一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強。民國七年，俄國革命，雖遇著國內國外反動勢力的夾攻，終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發現其根本綱領竟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原來俄國也是個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俄國的問題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紀，俄國沒有趕上時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歐洲大戰，俄國以二十倍德國的領土，兩倍德國的人口，尚不能對付德國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國的革命方略，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可供我們的參考。難怪中山先生雖知道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有大不同之點，早就承認列寧是他的同志。

在蘇聯革命的初年，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列寧亦樂與我們攜手。民國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與列寧的代表越飛（Joffe）共同發表宣言，聲明兩國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軍和共產黨的組織。是年冬，蘇聯派遣鮑羅廷來華作顧問。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徹底

的改組國民黨，並決定聯俄容共。同時蔣介石從俄回國。中山先生就請他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中山先生對黃埔軍校是抱無窮希望的。在開學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說過：

「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要這學校的學生來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兩廣的大調整時期：陳炯明勾結楊希閔、劉震寰以圖消滅新起的革命勢力。於是有兩次的東征，然後廣東得以肅清。同時革命政府協助了李宗仁、黃紹竑肅清廣西。

不幸在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了。革命的重擔大部份從此就遺到蔣介石同志的身上了。

從十五年七月九日起始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戰爭，蔣校長的事業是讀者們所熟知的，我們可以不必細說。但是有三個重要面向我們不能不注意。

第一、現任國民黨總裁的蔣校長在最近十餘年之內的事業一貫的以總理遺教為本。他認定偏左的共產主義和偏右的軍閥都是誤國的。他所領導的政軍始終不離開三民主義。最初誤會的人很不少。慢慢的他們認識了總裁的政策，由認識而生敬仰，終則一致的擁護。所以抗戰以來，國人不分黨派區域均團結於總裁的領導之下，一致抗戰。

第二、近年總裁鞭策全國邁向近代化這條大路上。鐵路的加修，全國公路網的完成，航空線的設立，無線電網的佈置，義務教育的提倡，科學及工程教育的獎進，及國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幾年的大成績。抗戰以前，全世界無不承認我民族已踏上了復興之路。日本的軍閥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決計向我們大舉進攻。

第三、九一八以來，國人有些為感情所衝動要求中央早戰，有些反動份子另懷陰謀，以為向日抗戰就能消滅中央勢力，於是假愛國的美名，鼓動早戰。總裁為民族計，忍受國人的非議和敵人的無禮，絕不輕言戰，亦絕不放鬆民族近代化的推進。我們能從九一八到七七得著七年寶貴光陰的建設，這是總裁深謀遠見的結果。

目前的困難是一切民族在建國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能追隨總裁，謹守總理的遺教，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附錄一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從順治到咸豐）

據東方出版社（民國學術經典庫）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補入。

——CTJ121

小引

小引系據臺灣《中央日報》印行《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九五三年四月臺北出版）。

這個小小的研究報告是二十年前寫的。原文登在《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因為國人對於中、俄關係及東北問題的看重，所以把這個研究報告作為單行本刊印出來。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試對外交當局貢獻一點意見。我說過：「東北問題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之下，而其困難反有過而無不及。我們應該早為預備。」我那時在南開大學教書，不但未入政界，並且沒有意思參加政治。我的建議不過根據我的研究，提出來以供當局參考。

因為我深感東北問題的重要，所以在我的工作研究中，東北占主要位置。可惜在最近這十幾年中，我不能繼續有系統的研究。我原來希望搜集中外的史料，把咸豐以後的東北外患也寫出來，現在好像找不到這樣一個機會。如果有學者願意擔負這種工作，我願意盡力協助。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於紐約

一、俄國的遠東發展

以下正文系據《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北平出版）。

我族在東北的歷史雖變故多端，概括說，可分為兩大時期。滿清以前，在東北與我族對抗的，不是當地的部落，就是鄰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我族之下。最近三百年的形勢就大不同了。從清初到現在，這三百年，東北最初受了遠自歐洲來的俄羅斯之侵略，最近又遭了西洋化的日本之佔據，而其他列強亦曾插足其中。現在東北已成所謂世界間

題。縱不說最近三百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於我族，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國力有非我們所能比抗。

俄國的歷史頗有與我相同的。在十三世紀，蒙古人一方面向南發展，併吞了華北的金及華南的宋；另一方面又向西發展，簡直席捲了中央亞細亞及俄羅斯，直到波蘭。我國受蒙古人的統治不滿百年，即由明太祖在十四世紀的下半葉光復了祖業。俄國終亦得到解放。惟蒙古人在俄國的施政並不如在中國那樣積極，而同時俄民族的觀念亦不及我族發展之早，故俄國的光復運動到十五世紀始由馬斯哥王國率領進行，其完成尚在十六世紀宜番（即伊凡）四世的時候。總計起來，俄國的光復比我國遲了二百年。

俄國反蒙古人的運動雖較遲，其發展之積極及持久反為我們所望塵莫及。我族自明成祖以後，保守尚感不足，遑論進取。俄國則不然。

俄人初越烏拉山而角逐於西比利亞者為雅爾馬克，所帶隊伍僅八百四十人；其時在西曆一五七九年，即明萬曆七年。此後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濱為止。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俄國的先鋒隊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濱建設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內，全西比利亞入了俄國的版圖，其面積有四百萬方英里，比歐洲俄羅斯還大一倍。

俄國在西比利亞的拓展並未與我國接觸，所以無敘述之必要。但其經過有兩點足以幫助我們瞭解日後中、俄初次在黑龍江的衝突，不能不略加討論。第一、俄國在西比利亞發展之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資助。西比利亞有三大河流系統：即俄比（Ob River System）系統，也尼賽

（Yenisei）系統，及來那（Lena）系統。俄比、也尼賽、及來那三大河雖皆發源於南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甚多，且大概是東西流的。一河流系統之支河與其鄰近河流系統之支河往往有相隔甚近者，且二者之間有較低的關道可以跋涉。俄人過烏拉山就入俄比系統；由俄比系統轉入也尼賽系統；再轉入來那系統，就到極東了。

俄人在西比利亞所養成的交通習慣與日後中、俄兩國在黑龍江的衝

突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黑龍江及其支河可說是亞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統。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惟獨黑龍江由西向東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時代，黑龍江是亞洲北部達東海最便捷之路。並且俄人有好幾處可以由來那系統轉入黑龍江系統。黑龍江上流有一支河名石勒喀

（Shilka）；石勒喀複有一支河名尼布楚（Nert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發源之地離威提穆河（Vitim）發源之地甚近。威提穆河就是來那河上流之一支，這是由來那系統轉入黑龍江系統道路之一。黑龍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名額爾必齊（Gorbitsa），其發源地與鄂列克瑪河（Olekema）之發源地相近，兩鄂列克瑪河也是來那河的一支，這是由來那轉入黑龍江的第二條路。黑龍江的中流有一支河，我國舊籍稱為精奇里河，西人稱為結雅河（Zeya River）。精奇里發源於外興安之山陽，其流入黑龍江之處，在其東現在有俄屬海蘭泡，亦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Blagoveshchensk），對岸稍南即我國的瑯瑯。自來那河來者可溯雅爾丹河（Aldan）或鄂列克瑪河之東支而轉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這是由來那系統入黑龍江系統的第三條路。在清初的國防上，這條路尤其要緊，因為最毗近東北的腹地。

第二，俄國十七世紀在西比利亞拓展之速多因土人無抵抗的能力，俄人用遊擊散隊就足以征服之。彼時西比利亞戶口稀少，土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組織尚在部落時代，其抵抗力還不及北美的紅印度人。比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俄比河上流的古楚汗國（Kuchum Khanate）。這國就是蒙古大帝國的殘餘。雅爾馬克（Yermak）於一五八三年奪取了其京都西比爾（Sibir），西比利亞從此得名，馬斯哥王亦從這時起加上西比爾主人翁的榮銜。一五八七年（明萬曆十五年），俄人在西比爾附近建設拖博爾斯克大鎮（Tobolsk）。雅爾馬克原來不過是一個土匪頭目，他的隊伍大部分是他的綠林同志。立了大功之後，馬思哥王（即莫斯科沙皇）不但寬赦了他，且優加賞賜；為國事捐軀之後，俄國教堂竟奉送他神聖尊號，雅爾馬克遂成了俄羅斯民族英雄之一。事實上，他無疑的

是俄國拓殖西比利亞的元勳。自他在俄比河戰勝古楚汗國之後，直到鄂霍次克海，俄人再沒有遇著有力的抵抗。

雅爾馬克及其同志，論人品及作事方法，皆足代表十七世紀俄人在西比利亞經營者。十七世紀，先鋒隊大都是兇悍而慣於遊牧生活的喀薩克（Cossack）。他們數十或數百成群，自推領袖。在俄國政府方面看起來，喀薩克的行動雖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確是利多而害少。他們自動的往前進，成功了，他們所占的土地就算是俄國的領土，他們從土人所收的貢品幾分之幾劃歸政府；失敗了，不關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別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處也有，這種遊擊散隊只顧目前，不顧將來；只顧當地，不顧全域。喀薩克過於殘暴，因此土人已不心服，且被殺戮者就是當地的生財者。在西比利亞作慣了，到了黑龍江流域，他們依然照舊橫行，不知道這地的形勢有與西比利亞不同者。

俄人發展到來那河流域的時候正是明崇禎年間。在明成祖的時代，中國在東北的政治勢力幾可說是空前絕後，黑龍江全流域以及庫頁島皆曾入明之勢力範圍。到天啟、崇禎年間，遼河流域尚難自顧，至松花江、烏蘇里江及黑龍江更無從顧及，明之舊業快要亡了。但滿清遂乘機收歸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時候，滿人連年東征北伐。其戰爭及交涉的經過，我們無須敘述，但其收復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為十七世紀中、俄的衝突根本是兩個向外發展運動的衝突，俄國方面有新興的羅馬婁夫（Romanov）朝代，我國方面有新興的清朝：可說是棋逢對手。

茲將清太祖及太宗所收的東北的部落及區域清單如下：

[1]窩集部（亦名窩稽達子，魚皮達子）。居牡丹江（亦名呼爾哈河，瑚爾哈河）及松花江下流兩岸，距寧古塔北約四百里，其中心在現今之三姓。

[2]穆稜。居烏蘇里江及其支河穆倫河的兩岸。

[3]奇雅，居伊瑪河的上流，伊瑪河（Niman, Iman, Imma, Ema）是

烏蘇里江東的一支河。

[4]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額登）。居松花江與黑龍江會流之處到烏蘇里江與黑龍江會流之處。

[5]飛牙喀（亦名費雅喀）。居黑龍江下流。

[6]奇勒爾。居黑龍江口沿海一帶。

[7]庫葉（亦名庫頁）。居庫頁島。

[8]瓦爾喀。居吉林東南隅及俄屬濱海省的南部及海山威附近的熊島。

以上皆東境的部落。

[9]索倫。居布特哈（齊齊哈爾以北的嫩江流域）。

[10]達呼爾。居嫩江以東到黑龍江一帶。

[11]鄂倫春。居黑龍江東之精奇里兩岸。

[12]巴爾呼（亦名巴爾古）。居呼倫貝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滿清武功所達極北之點就是日後中、俄相持的雅克薩城，俄人稱為 Albazin。崇德四年（一六四〇年），將軍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薩。

入關以前，滿人的勢力雖已北到黑龍江及精奇里河，東到庫頁島，並未在邊境設官駐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數編入八旗，大多數仍居原地，按期進貢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駐兵最近東北邊境者莫過於寧古塔。雖然，俄人入黑龍江的時候，除當地土人的抵抗外，尚有大清帝國的後盾，其形勢與西比利亞完全不同。

二、中俄初次在東北的衝突

俄人到了來那流域以後，不久就感覺糧食缺乏的大困難。他們從土人聽說精奇里河流域產糧甚多，這種傳說形容未免過度，好像一到外興安的山陽就是一片樂地。俄政府於一六三二年在來那河的中流設立雅庫

次克城（Yakutsk），派有總管，俄人所謂Voevod。一六四三年（崇禎末年），總管官彼得·格羅洛夫（Peter Golovin）派探險隊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調查真相。隊長是波亞爾科夫（Vasili Poyarkof）；隊員有喀薩克一百十二名，獵夫十五名，書記二人，引導一人。軍器帶有大炮一尊，槍每人一杆。他們於是年七月中從雅庫次克動身，逆流而上，由來那河入雅爾丹河。十一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結冰，不通舟楫。波亞爾科夫在河邊築了過冬的土房，留了四十三個隊員及輜重，自己遂率領其餘隊員跋山而南。行了兩星期的旱路之後，他們找著精奇里的支河布倫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才發現少數鄂倫春住戶，波亞爾科夫派了七十人到村裡去搜糧食。村民起初尚以禮相待；俄人求入村，未蒙允許，就動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人空手而歸。在饑寒交迫的時候，喀薩克不惜執殺土人或互相殘殺以充饑。一六四四年春，留在山北的隊員趕上了，於是合隊而行，由精奇里入黑龍江。沿途的土人皆罵他們為食人的野蠻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秋季波亞爾科夫到了黑龍江口，就在此過冬，強迫奇勒爾供給糧食。

俄人入黑龍江的那一年正是滿人入關的那一年。受其擾害的鄂倫春、達呼爾、赫真、飛牙喀及奇勒爾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如果求了滿人如何處置，這些問題，因為史料的缺乏，無從答覆。在入關之初，就是東北邊境有警報來，清廷亦無暇顧及。波亞爾科夫此次的成績並不好，除了沒有發現新樂園以外，他留給土人永不能忘的壞印象。雖然，經過這次的失敗，雅庫次克的總管知道了傳聞的虛實，而波亞爾科夫仍不失為第一個西洋人入黑龍江者。他在江口過冬以後，由海道北返。幾年之內，雅庫次克的總管不再費事於南下的企圖。

一六四九年（順治六年），雅庫次克的一個投機的富商哈巴羅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請總管許他用自己的資本組織遠征隊到黑龍江去。是時俄人已從土人探知由鄂列克瑪河的路比由雅爾丹河的路容易。總管佛蘭士伯克甫（Franzbekof）對此事雖不甚熱心，但哈巴羅夫

的提議既無須政府出資，萬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的力量收征黑龍江流域土人的皮貢，就允許了哈巴羅夫的呈請。其實政府的批准不過是一種形式；在呈請之先，哈巴羅夫已組織好了遠征隊，大有必行之勢。四月初，他率領隊員前進，溯鄂列克瑪河直到河源，於是跋山而轉入黑龍江的支河烏爾扎爾（Urka）。此河格額爾必齊，惟稍東。哈巴羅夫到黑龍江的時候，兩岸的村落已聞風遠逃。哈巴羅夫對所遇的少數土人雖竭力巧言誘吸，土人總以喀薩克是食人的一語答之。除在土坑裡發現匿埋的糧食外，其餘一無所獲。雖然，在其給總管的報告書中，哈巴羅夫仍誇大黑龍江流域的富庶及積糧之多。他深信有六千兵足以征服全區域，征服之後，雅庫次克的糧食問題可得解決，而皮貢的收入可大加增。

哈巴羅夫初次的遠征雖無直接的成績可言，他確信親自到了黑龍江，知道了當地的實在情形。他決志組織第二遠征隊並改良行軍的方法。一六五〇年的夏季，他就出發，所走的路線大致與第一次相同，這次他行軍極圖迅速，以免土人的遷徙。在雅克薩附近，他襲擊了一個村莊，土人與之相持一下午，終究弓箭不抵槍炮，雅克薩遂為所占。土人乘夜攜帶家眷牲口逃避，哈巴羅夫即夜派一百三十五人去追截。次晨就趕上了，一戰之後，喀薩克奪了一百一十七隻牲口，高興的返歸雅克薩。哈巴羅夫在雅克薩建築了防守的土壘，留下了少數的駐防隊，自己遂率領其餘隊員及槍炮，乘用冰車駛往下流。十天之後，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他遇著使馬的鄂倫春。此處也是弓箭不抵槍炮，一時土人惟有屈服，遵命貢送貂皮。哈巴羅夫的投機總算得了相當的收穫，於是回雅喀薩過冬。

次年六月二日，哈巴羅夫帶著三百餘名喀薩克，配齊槍炮，出發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圖攻人之不備。正隊以前，他預備了八隻小船以充先鋒。連行四日不見人煙，沿岸的村落皆遷徙一空。第四日晚間，在黑龍江折南的角段發現尚未遷徙的吉瓜托村（Guigudar）。此處居民約有一千，並有五十名八旗馬隊適在該處收征貢物。我國的記載全

不提及，故其虛實難明。哈氏乘夜進攻。據俄人的記載，交火之初，滿人就逃了。次晨村落失守，土人欲逃不能。死於炮火之下者約六百六十人，女人被擄者二百四十三，小孩一百一十八，馬二百三十七，其他牲口一百一十三。俄人死四名，傷四十名。哈氏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我方關於此事全無紀錄以資對證。

哈巴羅甫在吉瓜托村約留了六星期。他派出的調查隊均說直到精奇里河口，土人早已遷徙，惟聞在河口尚有未遷徙的村落。哈氏乘坐小船趕到現在瑯瑯城左右，土人事先全無所知，既不能逃，又不能戰，大部分都成俘虜。哈氏命土人的長老召集會議。到會者三百多人，均說剛向中國皇帝進了貢，餘存無幾，一時只能奉送貂皮六十張，以後當陸續補送，哈氏令土人以貂皮贖俘虜。他的投資又得著紅利了。土人竭力應酬他，好像他們已甘心投順喀薩克。但九月三日全村忽遷徙一空，僅留下兩個當質者及兩個老女人。此舉給哈氏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原擬在此過冬，不料周圍忽然變為全無人煙之地。他們把四個未逃的土人付之火中，遂開拔向下流去了。

九月二十九日，哈氏行抵烏蘇里江與黑龍江合流之處。此地現有哈巴羅夫城，即紀念哈氏之功績者，我方命名伯力。哈氏在此建築土壘，準備過冬。赫真人表示和好，因之哈氏不為設防，時常派遣隊員出外捕魚。十月八日，赫真人忽乘虛進攻。相持之際，適外出的隊員歸來，加之軍器相差太遠，赫真人大受挫敗。從此喀薩克作了當地的主人翁。

按俄國的紀載，黑龍江的土人受了兩年的擾害之後，均向中國求保護。我方的紀載亦提及此事，但不詳細。《平定羅刹方略》說：「駐防寧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烏扎拉村，稍失利。」俄國方面的紀錄說：海色帶有二千零二十騎兵。至於戰爭的經過則各說不一。海色與哈巴羅夫的戰爭是中、俄初次的交鋒。我國史乘從順治九年起始有「羅刹」之亂之紀載。按「羅刹」這名詞是索倫、鄂倫春、達呼爾諸部落給俄人的稱呼。這一戰，俄國方面的人數至多不過四百人；我方加入戰爭

者必較多，但是否有二千餘名，頗難斷定。順治十四年，寧古塔設昂邦章京一員，副都統一員。康熙元年，昂邦章京改為鎮守寧古塔將軍。十年，寧古塔副都統移駐吉林。十五年，寧古塔將軍移駐吉林，而於寧古塔設副都統。從這年起，吉林將軍領兵二千五百一十一名，寧古塔副都統領兵一千三百二十名，從此看出我國東北邊境駐軍首重寧古塔，後移重心於吉林。惟順治十四年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確定。戰爭的經過，我方的紀錄僅說「稍失利」。俄方的紀錄則分兩說，一說：

「一六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俄曆）黎明，滿洲兵到達俄國土壘之前，俄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滿人不即施放火槍——他們放槍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羅夫或將不能生還。幸而他被槍聲驚醒了，即時設備。滿人又把炮安置以後，就向土壘開火。不久打穿一個洞口，衝鋒者即向洞口猛進。俄人火速在洞口之後安置一炮，向衝鋒者開放極有效力的彈子，衝鋒者因此止住了。而一百五十名俄人從營壘沖出來，以短兵相接。他們從滿人奪取了兩尊太近的炮。滿人的火槍大半被毀之後，俄人就成了戰場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說的兩尊炮外，俄人尚得著十七杆火槍，八面旗幟，八百三十匹馬及幾個俘虜。滿兵死者聽說有六百七十六人遺留在戰場之上，俄人僅死十名，傷七十名。」

另一說則謂：

「交鋒之初，中國人得了勝利，一時好像他們能把俄國營壘攻下來。後不知因何原故——或者因為中國的主將過於自信，或者因為他遵守訓令——在俄人受迫最緊急的時簇，他忽然下令，要他的兵士不殺也不傷喀薩克，只活拿過來。這一戰的最要關鍵即在此。俄人瞭解這種形勢之後，決志不被活拿。於是一面宣誓，一面衝鋒，步步的把中國人趕退

了。一個軍隊不能一面受敵人之火，一面又被禁還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國兵從此喪失戰鬥精神，向後退避，留下十七杆槍，二尊炮，八面旗幟，八百三十匹馬及許多糧食。俄人死十名，傷七十八名。哈巴羅夫從土人——不可靠的來源——聽說中國兵死了六百七十六名。」

這一戰，中國確是敗了，但先勝而後敗。致敗之由，除策略或有關係外，尚因軍器不及敵人。至於戰敗的程度很難說了。此戰以後，俄國方面的報告多說喀薩克一聽見某處有中國兵，就戒嚴不敢前進，而且從這時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順治九年，烏扎拉之戰以後，哈巴羅夫率領全隊逆流而上，途中遇著雅庫次克總管派來的補充隊，共計一百一十七名喀薩克及軍需。八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隊員內訌，致分為二隊，一隊二百一十二人仍服從哈氏，另一隊一百三十六人則自樹一旗，從此黑龍江上下有二隊喀薩克遊行搶掠。以往哈巴羅甫及雅庫次克總管給馬斯哥的報告已引起俄國政府相當的注意和熱心，當時擬派兵三千前來黑龍江，以圖永久佔領。同時，俄國政府對喀薩克的暴行亦有所聞，遂決定先派小援隊並調查實況。十年，援隊抵黑龍江以後，哈氏返俄覆命，但一去未回，他從此就離開歷史舞臺了。俄國政府亦未實行大隊遠征的計劃。

哈巴羅甫夫的繼任者是斯德班樂甫（Onufria Stepanov）。斯德班樂甫於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的春天進松花江，五月二十四日遇著中國軍隊。喀薩克自己的紀錄說他們火藥用盡，故就退了。雖然，退的時候，喀薩克心志慌亂，大有草木皆兵之勢。從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瑪爾河口，就此築壘防禦。我國軍隊也追到這地。順治十二年春，遂圍呼瑪爾營壘，經三星期之久，無功而返。《平定羅刹方略》說：「十二年，尚書都統明安達禮自京率師往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頗有斬獲，旋以餉匱班師。」「响匱」是很自然的，因為經過羅刹數年擾亂之後，

地方居民已經遷徙他處；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羅刹不能就地籌餉，而呼瑪爾偏北，路途甚遠。這是當時在東北行軍最大的困准。

順治十三年及十四年，斯德班樂甫多半的時候在黑龍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東。「十四年，鎮守寧古塔昂邦章京沙爾呼達敗之於尚堅烏黑；十五年，覆敗之於松花、庫爾翰兩江之間。」十四年的戰爭，俄國方面沒有紀載，尚堅烏黑不知在何處。十五年（一六五八年）的戰爭，俄國的紀錄也甚簡略，但其結果則言之甚詳。戰後，斯德班樂甫及二百七十名隊員不知下落，餘二百二十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虜和上次在呼瑪爾所得的俘虜均安置於北京的東北隅，斯氏是否在內，不得而知。此後黑龍江上無整隊的羅刹，散隊則時見。「十七年（一六六〇年），巴海大敗之古法壇村，然皆中道而返，未獲剪除，以故羅刹仍出沒不時。」雖然，雅庫次克總管從此以後不接濟，也不聞問黑龍江的羅刹了。

在康熙年間，羅刹來自也尼賽，隸屬於也尼賽總管。從順治九年起，也尼賽的俄人常有小隊到拜喀爾湖以東石勒喀河上。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也尼賽總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據這些私人的報告，呈請俄國政府許他在石勒喀河上設立鎮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議，且即派他為遠征隊的隊長。他於次年七月十八日從也尼賽城動身，帶有五百六十六人。他由也尼賽河轉其支河昂格勒（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順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與石勒喀河會流之處設立尼布楚城，這是俄人經營黑龍江上流的根據地。不久就缺乏糧食和軍火，而所派出尋覓斯德班樂甫的探員全無結果。順治十八年，留了少數駐防隊，遂回也尼賽，巴石哥夫所受的艱難未得著相當的收穫。

也尼賽總管在黑龍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以前雅庫次克總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當時雅庫次克因失望遂不願繼續進行，於是有私人哈巴羅甫出而投機。也尼賽亦復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機者是柴尼郭夫斯奇

（Nikifor Chernigovsky）。柴氏是個盜匪頭子，因為殺了一個總管官，他遂率領他的綠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薩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築土壘，強迫土人交納貢品，且自行種植糧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時其他喀薩克有在額爾古納河築壘收貢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騷擾者。我國邊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順於俄國者，其中最著者莫過於根忒木爾。我國屢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終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間中、俄的關係更趨緊張。

康熙帝原來不想以武力解決羅刹問題。他屢次派人到雅克薩、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同時俄國政府從順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亦屢次派使到北京來交涉，因路途相隔之遠，文書翻譯的困難，羅刹之不聽政府命令，及中國在邦交上之堅持上國的地位，凡此種種均使外交的解決不得成功。（戰前及戰後的外交留待下節敘述，本節限於軍事的衝突。）等到三藩之亂一平定了，康熙帝就決定大舉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七月，帝派「副都統郎坦與彭春率官兵往達呼爾索倫，聲言捕鹿，因以覘視羅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督修戰船」。郎坦等的報告以為「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諭曰：

「朕意亦以為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拉（吉林）寧古塔兵一千五百名，並置造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教之演習者。於璦琿、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錫伯、烏拉之官屯，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

康熙帝在籌畫此次征役的時候，最費苦心的莫過於糧食的接濟，他以為往年的失敗都由餉匱，以致羅刹不能肅清。

二十一年算為覘探敵情之年。二十二年起大事預備，築璦琿城為後

路大本營，修運船、戰船，通驛站，運糧食，調軍隊，聯絡喀爾喀的車臣汗，共費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國舊曆），彭春始帶兵抵雅克薩城下。其部隊自吉林、寧古塔調去者三千人，自北京調去的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自山東等省調去的官一百零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自福建調去的藤牌兵三百餘人，索倫兵約五百人，總計不過五千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人說此次中國軍隊有一萬八千之多，與實數相差一倍以上。

俄人雖早已知道中國的軍事行動，且竭力預防，但等到兵臨城下，雅克薩的防守隊連商人、獵夫、農民及喀薩克部包括在內，不過四百五十人，不到中國兵數的十分之一！我國軍隊與外國軍隊戰鬥力的比較，從康熙年間到現在，究竟有進步呢，還是有退步呢？彭春第一著發表康熙帝的招撫書：

「前屢經遣人移文，命爾等撤回人眾，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構亂不休。乃發兵截爾等路，招撫恒滾諸地羅剎，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克薩，特遣勁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民，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復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為界，捕貂收賦，毋複入內地構亂；歸我逋逃，我亦歸爾逃來之羅剎。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安居，兵戈不興。倘執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眾矣。」

城內的羅剎置之不答。彭春遂開始攻擊。

我方關於戰爭的紀錄甚簡略：

「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陸兵為兩路，列營夾攻，複移置火器。二十五日

黎明，急攻之，城中大驚。羅刹頭目額裡克舍等勢迫，詣軍稽顙乞降。於是彭春等複宣諭皇上好生之德，釋回羅刹人眾。其副頭目巴什裡等四十人不願歸去，因留之。我屬蒙古索倫逃人及被擄者鹹加收集，雅克薩城以複。」

俄國的紀載大致相同，惟有數點可資補充。第一日的戰爭結果，俄方死百人。經數日後，教士率居民向總頭目官額裡克舍拖爾布殘（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戰，額裡克舍見勢已去，遂允所請。他派代表到中國軍營議投降條件，所要求者即許俄人攜帶軍器輜重回國。我方接收，事實上有二十五人甘願留居中國，數目與我方的紀錄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薩投降的俄人後亦安置於北京城內之東北隅。

羅刹退去以後，中國軍隊把雅克薩的城壘及房屋全毀了，但四鄉的禾苗並未割去，就全軍回瑯琿。雅克薩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設卡倫；甚至從瑯琿起，全黑龍江上流恢復戰前無主的狀態。清廷以為羅刹問題完全解決了：足證我國受了四十年的擾害還未認清敵人的性質。

額裡克舍的後退全由於勢力的單弱。其實在雅克薩戰爭的時候，也尼賽總管已派有援軍在途，共六百人，由普魯斯人拜丁（Afanei Beiton）率領。額裡克舍退出雅克薩後，未滿一日，即於途中遇著援軍的先鋒隊百人，帶有十足的軍器。額裡克舍到了尼布楚僅五天，拜丁的大援隊也到了。於是也尼賽總管派拜丁額裡克舍複整軍前往雅克薩。此次他們帶了六百七十一人，五尊銅炮，三尊鐵炮，均配足火藥，後面絡繹尚有接濟。他們到了雅克薩，一面收割四鄉的糧食，一面從新建設防具。我國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始得羅刹複來的報告，清廷即命薩布素及郎坦帶兵去攻。此次戰爭較久，較烈。六月，我軍抵雅克薩。十月底，俄人防軍僅剩一百一十五人，仍不退不降。適俄國政府是時派代表到北京，聲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戰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薩之圍。中、

俄問題從軍事移到外交去解決了。

三、尼布楚交涉

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餘年中、俄在黑龍江的衝突，在俄國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動，馬思哥至多不過批准，有時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動機，最高在圖開闢疆土以邀功，普通不過為發財而已，此外實際急迫的目的在圖糧食的接濟。彼時俄國中央政府亦想與中國發生關係，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與地方的不同。我們試一研究俄國屢次派使來華的經過就能明瞭其動機所在。《東華錄》載：

「順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羅斯察罕汗於順治十二年遣使請安，貢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貢禮，賚而遣之，並賜敕，命每歲入貢。後於十三年又有使至，雖具表文，但行其國禮，立而授表，不跪拜。於是部議來使不諳朝禮，不宜令朝見，卻其貢物，遣之還。後閱歲，察罕汗複遣使齎表進貢，途經三載，至是始至。」

據此紀錄，則順治年間俄國曾三次派使來華：第一次在十二年（一六五五），第二次在十三年，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誤會，第一次的使者是亞爾班（Seikul Albin）。他不過是公使背喀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隨員，先到北京來報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背喀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實系一個使團。我們從俄國政府給背喀甫的訓令就能看出俄國對中國注意所在。俄王要背喀甫向中國皇帝轉達俄王的友誼及和好之善意，表示俄國歡迎中國公使及商人到俄國去，打探清廷對俄國的實在意志，是否願通使通商，調查中國接待外國的儀節，調查中國的國情如戶口、錢糧、軍備、城市與鄰邦的關係、出產以及中俄的交通，總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鄰。當時俄

國以為中國產金銀甚多，在重金主義（bullionism）盛行的俄國，以為與中國通商便可用西比利亞所產的皮貨及俄國的呢絨來吸收大宗金銀及絲綢。背喀甫的出使，除得知中國一般國情外，完全失敗。其主要原因即《東華錄》所謂「不諳朝禮」。換句話說，背喀甫不願以「貢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遞國書於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羅刹在黑龍江的騷擾。因此，清廷頗疑背喀甫之來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邊境？一六五八年，俄國又派亞爾班及浦爾費裡葉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國；一六六〇年（順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謂第三次的出使。他們所帶的國書首述俄王祖先聲名的偉大及鄰邦如何皆畏服俄國，後半表示願與中國通使通商。《東華錄》繼續說：「表文矜誇不遜，不令陛見。」所以這次也無結果。

康熙年間，中、俄的衝突轉移到黑龍江上流，這是上節已經說過的。除喀薩克的侵擾外，中、俄之間又加上根忒木爾（Gantimur）問題。此問題的原委頗不易明。根忒木爾乃達呼爾頭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國進貢，中國亦曾授以佐領職銜。俄人佔據尼布楚以後，根忒木爾遂率其部落遷居於海拉爾河及甘河左右。順治十二年呼瑪爾之役，他率部助清，但臨陣不曾前。戰後，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及九年，寧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員至尼布楚索根忒木爾。俄人始終拒絕引渡，說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該算是俄王的臣民。雙方所以這樣重視根忒木爾的緣故，因為他的向背足以影響當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總管亞爾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於九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來報聘。背喀甫出使的失敗足證當時中國如何不明世界大勢；這一次又表明俄國人之不懂中國國情。使者是米樂番樂甫（Ignashka Milovanoff），一個不識字的喀薩克！亞氏給他的訓令更加可笑，大意謂各國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的大君王亞裡克含米海羅韋赤（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護，大君王除概予保護外，且優加賞賜。中國的皇帝也應求大君王的保護，並應時常進貢及許兩國人民自由通商。米樂番

羅甫到北京以後，在理藩院被質問一番。他曾否執行訓令，理藩院得何印象，作何感想，我們無從知道。康熙許他陞見，但所行的是跪拜禮。最後清廷頒一封敕諭，要尼布楚的總管嚴行約束部屬，禁止他們侵擾中國邊境。這段往來好像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對說互不相懂的話，這樣的外交是得不著結果的。

康熙十一年，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國送回根忒木爾。這信是用滿文寫的，尼布楚及馬思哥均無人能翻譯，但俄國政府根據尼布楚的報告，以為中國要求俄國派使來華交涉。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二月，俄王遂派尼果賴罕伯理爾鄂維策斯巴費理（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記及報告與函件，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關係史的好史料，且間接對當時中國的內政，如三藩戰役及天主教傳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識的貢獻。本文限於中、俄在東北的衝突，故可從略。斯氏於康熙十五年六月抵北京，交涉共曆三月，絕無成績而返。中國對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爾及令喀薩克退出雅克薩；斯氏對中國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這是雙方的實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說未入正題就被種種儀節問題阻止了。最初斯氏堅持親遞國書於皇帝，後雖退步而呈遞於理藩院，但陞見的時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簡直未進行。在歸途中，斯氏曾致書於雅克薩的喀薩克，囑他們不要騷擾，但未見發生效力。

等到中國大舉進攻雅克薩的消息傳到馬斯哥的時候，俄國政府始知道黑龍江流域非西比利亞可比，土人之後尚有一個大帝國須對付，而這帝國決不讓俄國佔領黑龍江流域。究竟黑龍江一帶的地理如何，俄國政府並不知道。與其出師於萬里之外來與一大鄰國爭一塊可有可無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圖通商之發展。在中國方面，康熙帝素性不為己甚。三藩戰役之後，中國亟須修養。且外蒙古尚有厄魯特問題，其他部落亦未傾心向我，倘我與俄為己甚，則俄、蒙可相聯以抗我。俄人軍器的厲害及戰鬥精神的堅強，這是康熙帝所深知的。所以在未出師之前，

康熙帝對於軍備是慎之又慎，以策萬全的。外交雖已試過而未見效，康熙仍不絕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師往攻雅克薩；一面又致書於俄國政府，一封由傳教士轉遞，一封由荷蘭商人帶去。俄國政府既已有言歸於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為外交的進行辟了大路。二十五年九月，俄國要求停戰的使者米起佛兒魏牛高（Nicefor Venukirov）及宜番法俄羅互（Ivan Favorov）到北京，聲明俄國願與中國和好，且已派有全權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時下諭：「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使至後定議。」換言之，這是無條件的停戰。

俄國所派的全權大臣是費要多羅亞列克舍維赤果羅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國政府於一六八六年初頒給果羅文第一次的訓令，根據此訓令：邊疆應以黑龍江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爾（Bystra）及精奇里二河為界；再不得已，則以雅克薩為界。但俄人須能在黑龍江及其支河通商，並且通商除納關稅外，不應有限制。如果羅文能使中國派公使及商人到馬斯哥更好。俄國政府派了一千五百兵同行，以備萬一，且教果羅文設法聯絡外蒙古以助聲勢。果羅文於一六八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俄曆）在馬斯哥起程；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始抵拜喀爾湖南外蒙古邊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訓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龍江流域包括雅克薩，可認為中國領土；除非萬不得已，絕不可引起戰爭；倘交涉失敗，他可向中國提議雙方再派公使從新協議。

喀爾喀土謝圖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報告給北京以後，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薩的軍隊退璦琿。次年年初，他派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尚書阿爾尼，左都禦史馬齊，漢員二人，張鵬翻及錢良擇，及護軍統領馬喇帶八旗前鋒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團帶有傳教士二人，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yra），以助翻譯。索額圖等遵旨預擬交涉大綱如下：

「察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系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刹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為扼要，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及烏拉、寧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恒滾、牛滿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系我屬鄂倫春、奇勒爾、畢喇爾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退民終不獲安。臣以為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鄂羅斯。又我之逃人根忒術爾等三佐領及續逃一二人悉應索還。如一一遵行，即歸彼逃人及大兵俘獲招撫者，與之劃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康熙帝當時批准了這個交涉大綱。我代表團所負的使命全見如此。我們若以俄國給果羅文第一次的訓令與此大綱相比，則中、俄的目的抵觸甚多，因為雙方都要黑龍江的上流從尼布楚到雅克薩，若以俄國政府第二次的訓令與此大綱相比，則雙方所爭者僅尼布楚城。

我使團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從北京啟程，取道張家口，庫倫。適此時喀爾喀與厄魯特戰，路途被阻。索額圖等一面率領團員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國代表阻道的原委，並要求改期改地會議。果羅文指定尼布楚為交涉地點。次年（一六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使團複由北京出發。此次代表中沒有阿爾尼及馬齊，但添了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都統郎坦，都統班達爾善及理藩院侍郎溫達。此次所帶的兵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龍江兵一千五百人，倘總計軍中夫役及官員的僕從，全代表的人數約在八千左右。中國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沒有過於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團的兵數是否因為果羅文也帶有兵來，我們無

從知道。不過當時的人，如我們一樣，覺在外交應有武力的後盾，但他們的後盾未免過於放在前面了！康熙帝雖對於軍備主積極，而對於交涉目的則主退讓。使團出發以前，曾擬議交涉大綱應仍舊，康熙帝大不以為然：

「今以尼布楚為界，必不與俄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

康熙帝的實在理由或者是因為厄魯特與喀爾喀的戰已起，中國應速與俄國結案，以使用全力來對付蒙古問題。大綱經此修改以後，實與俄國政府第二次的訓令無所抵觸。倘尼布楚的交涉失敗，則其故並不在兩國政府目的的懸殊。

六月中，我代表團抵尼布楚。俄人見我方軍容之盛，不知我方實意在議和，抑在交戰。果羅文遲到二十天。因為雙方軍備甚嚴，一時空氣頗緊張。應酬費了幾天功夫，遂決定開議形式：雙方可各帶七百六十兵赴會，但其中五百須留會場外，二百六十可入會場，站在代表後面。會場形式豈不有點《三國志演義》的風味？

七月初八初次會議，果羅文提議中、俄兩國應以黑龍江為界，江左（北）屬俄，江右（南）屬華。索額圖則謂俄國應退至色楞格以西；以東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薩皆應屬中國。雙方皆要價甚高，故相差甚遠。次日，中國代表首先減價：色楞格及尼布楚願讓歸俄國，這是遵守朝廷的訓令，也是我方預定的最低限度。果羅文付之一笑，以為該二處無須中國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無進展。我代表遂提議雙方簽訂正式會議紀錄，以俾各返國覆命。這等於宣佈會議決裂。次晨，果羅文派人來聲明接收此項提議，但要求再開會議一次，我

方不允。張誠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許可，以私人的資格往訪果羅文。張誠等的疏通，據其日記有如下狀：

「馬斯哥人實際渴望和平不在我們（中國代表團）之下，對於我兩人的訪問，他們表示愉快。我們起頭就對他們說：如果他們不願意放棄雅克薩及附近的土地，那麼，他們用不著再費事了，因為我們確實知道我們的大使曾得著明文的訓令，非得此地不立約。至於尼布楚和雅克薩之間的地方及黑龍江以北的地方，我們不知道大使們可退讓到什麼地步。馬斯哥的代表可一斟酌他們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薩之間的界限，我們的大使因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馬斯哥的全權代表回答說：「既然這樣，他就請我們的大使把最後的決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國代表一早就派人來問我方最後的決定。我代表團在地圖上指出額爾比齊河及外興安山脈，謂河以東及山以南應歸中國，河以西及山以北應歸俄國，此外則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俄人辭退後，我代表遂派張誠及徐日升去探問俄方最後的決定，並聲明外蒙古及俄國的界線應同時劃清。果羅文以職權的限制，並以我國勢力未到外蒙古，拒絕交涉蒙、俄界線。我方未堅持此點，但聲明到厄魯特及喀爾喀的戰爭平定以後，蒙、俄間的界限必須劃清。這個支節過去以後，俄方又提出一個要求：在額爾古納河以東的俄人可搬回國。這點我方於七月十三日就答應了。這樣，和議似乎已成。不料這時果羅文反要求雅克薩及其以西的土地應歸俄國。張誠及徐日升面斥果羅文之無信義。在他們努力疏通之初，他們就說破，倘俄國放棄雅克薩則不必費事；何以此時又舊話重提？張誠等向薩布素報告俄國盡反前議以後，我代表團即時召集全國文武會議，決定當夜全軍渡河，以便包圍尼布楚城；同時一面派人去鼓勵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調少數軍隊回雅克薩去剷除禾苗。俄代表見勢不佳，即派人來，微示可讓雅克薩之意。我代表團複開會議，不進呢，恐俄人行緩兵之計；進呢，又怕因軍事行動斷絕和平的希望。代表團請張

誠及徐日升發表意見，他們答以身為教士，不便也不能參與軍事。代表團終決定按原定計劃進行，惟對俄方則說移動人馬專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我軍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時候，俄代表正式承認我方所提出之界線。薩布素等遂派張誠去作最後的交涉。次日果羅文提出三種新要求：第一，中國以後致俄王的信應書俄王的全銜，並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詞句；第二，兩國應相互尊重公使，並許其親遞國書於元首；第三，兩國人民如持有政府護照，應許其自由往來貿易。關於第一條，我代表等答以國書中的稱呼及詞句是皇帝所定，為臣子者不敢擅允；關於第二條，我方答以中國向不派駐外公使，倘俄國派使來華，接待的禮儀必從優；至於自由通商一節，我方以為無問題，惟買賣小事，似不必載諸條約。果羅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權利，實已完成其主要使命，此節他不能不編入約款。最後關於界線的東段，雙方發生稍許爭執。外興安脈之東段分南北二支：北支繞烏特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濱；南支在烏特河之南而不到海濱。若以南支為界，則近海一帶須另劃界；若以北支為界，則烏特河流域將全屬中國，其地面積甚大，且產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產魚。果羅文向我代表索解釋的時候，我方答以約稿系指北支。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十九日，俄方竟無回音，我代表以為是功虧一簣，頗為之覺急。因為烏特河流域非朝廷訓令所必爭，倘因此債事，朝廷未必不責備。張誠從旁勸我代表不必堅持，於是薩布素等遂決派張誠去提折中辦法，把烏特河流域由兩國均分。適俄方亦派人來，帶有果羅文致我代表的信，懇求我方完成和議，信中也提出折中辦法，即暫不劃分烏特區。我代表當時接受，和議算告成了，所餘者僅條文的斟酌及約本的繕寫。

《尼布楚條約》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西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俄曆八月二十七日簽訂的。中國代表在一份滿文，一份拉丁文的約本上簽了字，蓋了圖章；俄國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約本上簽了字，蓋了圖章。所以僅拉丁文的約本是由雙方簽了字蓋了章的。

簽訂後，兩國代表起立，手持約本，各以其國主之名宣誓忠實遵守，並祈「無所不能的上帝，萬物之主」作他們意志忠實的監視者。同時雙方軍隊鳴炮以資慶祝。張誠說康熙帝曾有明令，要代表們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為惟獨這樣可以使俄人永遠遵守，所以這約的簽訂是經過鳴炮誓天的。

《尼布楚條約》在我國方面所注重的是劃界，在俄國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雙方均達到了目的，故此約得實行一百六十餘年。照這約，不但黑龍江、吉林及遼寧三省完全是中國的領土，即現今俄屬阿莫爾省及濱海省也是我國的領土。根據此約，我們的東北可稱為大東北，因其總面積幾到八十萬方英里，比現今的東北大一倍有餘；也可稱為全東北，因其東其南均有海岸線，有海口，其北有外興安的自然界線——國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吾國當時所以能得此成績，一則因為俄國彼時在遠東國力之不足，關於遠東地理知識之缺乏及積極開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則因為康熙帝處置此事之得法，軍事上有充分之準備，而外交上又替俄國留了餘地。其結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國在外蒙古的軍事曾未一次受俄國的牽制。「以往所有的爭執，無論其性質如何，今以後永遠忘記不計。」這是條文的第三款。這一層完全做到了：中、俄兩民族曾未因十七世紀的衝突而懷舊怨。關於將來，此約雖未永久有效，基督徒雖亦不計「無所不能的上帝」的監誓而不守信，但確立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誼的基礎。在國際條約中，《尼布楚條約》算得一個有悠久光榮歷史的。

四、東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寧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額圖等關於尼布楚立約的奏報到了北京以後，康熙帝遂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東北邊疆善後的辦法。他們提議應於額爾必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拉丁、蒙古字於上」，並於墨爾根及琿琿設官兵駐防。這兩件事都實行了。可

惜界碑是由中國單獨立的，不是會同俄國立的。碑文不是條約全文，是條約撮要。據俄國傳教士Hyacith的實地調查，在額爾必齊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興安嶺以北屬俄國」誤刊為「以南屬俄國」，俄人以為是個好預兆。並且有幾個界碑實非立在邊界上。一八四四年，俄國國立科學會（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學家米丁多甫（A. Th. Von Middendorf）到遠東來調查。他發現中國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興安的山峰，是在急流河（Gilu）與精奇里河合流之處；最東北的不是在外興安與烏特河之間，是在烏特河及土格爾（Tugur）之間，中國自動的放棄了二萬三千方英里的土地！

至於駐防的軍隊，中、俄戰爭的時候，中國以瑯瑯為大本營，設將軍鎮守；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將軍移駐墨爾根；三十八年，複移駐齊齊哈爾，步步的離黑龍江遠了。吉林省亦複如是：原來中心在寧古塔，已離邊境甚遠，後來中心複向內移至吉林省城。雖然，以兵數而論，我們不能說清廷疏於防備。曆十八世紀，前後兵數雖略有增減，東三省駐防軍隊約在四萬左右，內奉天將軍所轄者一萬九千余人，吉林將軍所轄者九千六百餘人，黑龍江將軍所轄者一萬一千四百人。黑龍江西境設有十二卡倫，每卡倫駐兵三十二名，三月一更；北境設有十五卡倫，每卡倫駐兵二十名，一月一更。這些卡倫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離邊境甚遠，且恐是有名無實的。此外黑龍江將軍每年四五月間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邊，「遇有越境之俄羅斯，即行捕送將軍，請旨辦理」，惟巡邊實亦不到極邊。

我國政府所派人員實際到黑龍江極邊去的次數及地點頗難稽考。惟《東華錄》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七月「癸亥」條載有將軍富僧阿的奏摺，內有關於巡查極邊的事情。這時因為「俄羅斯近年諸事推諉，不能即速完結，且增加稅額，以致物價昂貴」，所以停止恰克圖貿易。因為停止貿易，乾隆帝恐俄國侵擾邊境，所以教黑龍江將軍調查並整理邊防。富僧阿的奏報如下：

「據往探額爾必齊河源之副都統瑚爾起稟稱：自黑龍江至額爾必齊河口，計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七里至興堪山（即外興安）：其間並無人煙蹤跡，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協領納林布稱：自黑龍江入精奇里至都克達（Dukda）河口，計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里至興堪山：其地苦寒，無水草禽獸。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協領偉保稱：自黑龍江經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複過英肯（Inkan）河，計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行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興堪山：地亦苦寒，無水草禽獸。又往探牛滿（Niman）河源之協領阿迪木保稱：自黑龍江入牛滿河，複經西里木第河入烏瑪里（Umalin）河口，計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陸路四百五十六里至興堪山：各處俱無俄羅斯偷越等語。」

查呼倫貝爾與俄羅斯接壤之額爾古納河，西岸系俄羅斯地界，東岸俱我國地界，處處設有卡座，直至珠爾特地方。現複自珠爾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設二卡，於索博爾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羅斯鼐瑪爾斯斷難偷越。其黑龍江城與俄羅斯接壤處有興堪山，綿亙至海。亦斷難乘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與俄羅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後，從未往查。嗣後請飭打牲總管每年派章京、驍騎校、兵丁，六月由水路與捕貂人同至都克達、英肯兩河口，及鄂勒布、西裡木第兩河間遍查，勿報總管，轉報將軍。三年派副總管、佐領、驍騎校，於冰解後由水路至河源興堪山巡查一次，回時呈報。其黑龍江官兵每年巡查額爾必齊河，照此三年至河源興堪山巡查一次，年終報部。

這是乾隆年間東北邊境的概況及加添的邊防辦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實行到何等程度，無從知道。

除立碑及邊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緒末年毫無柘植東省的計劃和設

施。順治年間，多數滿人入關。在關內住慣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願意回去。乾隆年間，因北京旗人過多，朝廷曾資遣少數到關外去開墾，彼時尚得著相當成效。後來滿人漢化程度高了，無論在關內生計如何困難，朝廷雖資遣之，總不願去，或去後不久複回。漢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間，因關內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於此時禁止漢人出關。這種禁令自然難於實行，而官吏亦未必認真實行，故雖無大規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複不少。惟吉林東部、烏蘇里江一帶及黑龍江下流既未設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來，是少而又少的。國家並未從東北邊疆得著任何實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參而已。

《尼布楚條約》以後，東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餘年的安寧，其原因不僅在我國防邊之嚴，此外還因為俄國彼時對遠東的消極。尼布楚訂約的時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始獨攬政權的時候。從彼得起，歷十八世紀，俄國政府集中力量，北與瑞典爭波羅的海的東南境，南與土耳其爭黑海北岸，西與普魯斯及奧斯抵亞爭波蘭。十八世紀末年及十九世紀初年，歐西有拿破崙的戰爭，俄國也轉入那個漩渦，所以無暇來與中國爭黑龍江流域。同時在這一百五十年內，俄國起初與我國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後來改在恰克圖。為維持及發展中、俄的貿易，俄國政府很不願與中國引起衝突。

雖然，在這一百五十年內，俄國政府及人民對於遠東亦未完全置之度外。十八世紀初年，俄人佔據堪察克；以後繼續前進，過比令海峽（Bering Strait）而佔領阿拿斯喀（Alaska）（即阿拉斯加），就是在黑龍江流域。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俄國獵夫、罪犯、軍官及科學家違約越境者不知凡幾。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測量家邵比耳晉（Sholelzin）及舍梯羅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們在急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處發現一個俄國獵戶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約百里遇著幾個從尼布楚來的獵夫。次年，他們從黑龍江上流而下，路過雅克薩的

時候，看見一名喀薩克及一家俄羅斯與通古斯合種的人在那裡居住。雅克薩以東六十里，他們又看見一家俄羅斯及通古斯的合種。十九世紀初年，嘉慶年間，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薩。同時植物學家杜爾藏甯羅甫（Turcyahinov）調查了黑龍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薩為止。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大佐拉底神斯奇（Ladyshinsky）為調查界碑，也順流到雅克薩。罪犯越境而有記錄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羅甫（Rusinov）及色爾可甫，在嘉慶二十一年有瓦西利葉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龍江往來了六年，從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遊記。道光二十一年，米丁多甫調查了黑龍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著一個逃罪的遊客。這皆是見諸紀錄的。

《尼布楚條約》以後，俄國科學家及官吏提倡再佔據黑龍江者亦不乏人。在十七世紀的前半，俄人初到來那流域的時候，因為感覺糧食的困難，就派人進黑龍江。在十八世紀亦複如是。得了堪察克以後，接濟發生困難。從雅庫次克到堪察克的路途太難，幾至不可通行，糧食的接濟多由雅庫次克運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運到堪察克。雅庫斯克既乏糧食，而從雅庫次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難，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龍江：若能從尼布楚經黑龍江運糧到海，再由海道運到堪察克，則接濟問題就解決了。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西比利亞歷史家米來爾

（Müller）曾發表著作提議此事。一七四六年，大探險家比令

（Bering）的同事齊利哥甫（Chirikof）提議俄國應佔據黑龍江口而立市鎮。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西比利亞巡撫米也梯雷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龍江運輸的具體計劃書。俄國貴族院接受了他的計劃，並囑外交部與中國交涉。俄國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總兵雅哥備（Jacobi）調查中國在黑龍江的軍備。雅氏的報告說中國在沿江各處留有四千的駐防隊。倘俄國要利用黑龍江，須秘密預備軍隊，中國若不許，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舉費用過大，俄國政府不願實行。與中國的交涉亦完全失敗：「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羅斯請由黑龍

江挽運本國口糧，上以其違約不許。」十八世紀的下半葉，一個法國探險家拿佩羅斯（Lapéouse）及一個英國探險家蒲閣哈頓（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龍江口及庫頁島，他們調查的報告均謂庫頁非島，乃半島；黑龍江口只能繞庫頁的東邊，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灘，航行不便。因此俄國對於黑龍江的航行權也就冷淡了一些。一八〇三年（嘉慶八年），俄國政府始又組織遠東調查隊，由庫魯孫斯德（Krusenston）領導。庫氏建議俄國應佔據庫頁島南部之安義瓦灣（Aniwa Bay），以便再進而佔據吉林省之海岸線。同時俄國政府派果羅甫金（Golovkin）充公使來華交涉。政府的訓令要他向中國要求黑龍江的航行權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權。如中國不允，則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龍江航行一次，以便運送接濟給堪察克及俄屬北美。如中國再不允，則根據《尼布楚條約》要求進內地通商及北京駐使。清廷得到果羅甫金出使的消息以後，就飭地方官吏預備沿途的招待。後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奏報俄使不知禮節，清廷就教果氏自庫倫逕回本國，不許進京。所謂「不知禮節」究是何事，我們不知道。果氏出使的失敗可算到了十分。他經過這次的失敗，深信俄國所希望的權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須一軍的軍長方能濟事。他以為俄國無須佔領全黑龍江，只要得著下流及精奇里河與烏特河之間的土池就夠了。伊爾庫次克的巡撫哥爾尼祿甫（Kornilof）因果氏所得的待遇，亦憤憤不平，主張即派艦隊進黑龍江以資恫嚇，俄國政府不允。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險家米丁多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烏特河區域，當地的形勢及中國在該處政治及軍事勢力的薄弱，他都調查清楚了。他的報告大引起俄國朝野的注意。

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東北的外患又趨緊急，形勢的嚴重遠在十七世紀末年之上。因為這時候正演著英、美、俄、法四大強權爭北太平洋優勢之第一幕。是時英國是無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興未艾之勢，俄、美、法各國處處嫉英妨英。鴉片戰爭的時候，英國在中國得著許多通商權利，美、法即步後塵，惟恐英國獨佔，中國的腐弱亦因此戰而暴

露於天下。同時在北太平洋的東岸，各國的競爭更加劇烈。直到十九世紀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國的屬地，南有西班牙（即西班牙）的屬地，兩國雖未分界，但兩國均不容他國置喙其間。但美國一方面由東向西發展，其西疆墾民如海潮一般的前進；一方面波士頓、紐約及菲列得爾菲爾（即費城）為發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羅海獺皮及到檀香山去收買檀香，以便到中國廣州來交易。一八二一年，俄國政府宣佈北美西部從比令海峽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屬的領土的時候，美國政府即提出抗議，並宣佈門羅主義，結果俄國承認五十九度為其南岸。俄國所放棄的土地——當時統稱為阿雷根（Oregon）。英、美兩國又起爭執，最初定為兩國共有；等到分界的時候，美國堅執五十四度四十分為英、美的界線。一八四四年總統選舉的時候，美國的急進分子甚至以承認「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戰」為對英的口號。一八四六年，英、美終定四十九度為界線。英、美的問題雖以外交解決了，美國與墨西哥則打了兩年，結果在一八四八年全加利福尼亞的海岸劃歸美國。北太平洋的東岸就由英、美、俄三國瓜分了。這時候，因為汽船的實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進步。列強均感覺世界的歷史已到了所謂太平洋時期。因為競爭之烈，各國都怕落後，都感覺我不取則彼將先取之。十九世紀中葉，東北的外患實際就是列強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這時正值中原多故，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外有英、美、法三國的通商條約修改的要求，中國國運的艱難，除最近這一年外，要算咸豐年間。論物質文明，自十七世紀中、俄兩國比武以後，俄國隨著西洋前進，不但軍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慣用汽船。咸豐時代的中國所用之軍器、軍隊及交通完全與康熙時代的中國相同，而在國計民生上反有退步，這關之難過可想而知。

五、俄國假道出師與脅誘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I）當政的時候（一八二五至一

八五五年），俄國同時向三方面發展：近東、中亞細亞及遠東。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壯軍人木裡裴嶽幅（Count Muraviev）為西比利亞東部的總督。以前百數十年學者及官吏對於黑龍江的計劃和企圖，到了木裡裴嶽幅的手裡就見諸實行了。木氏第一步派軍官萬甘羅甫（Vaganof）帶喀薩克秘密越境來調查黑龍江沿岸的情形，萬氏曾隨登多甫到過恒滾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後，絕無音信，木氏反以罪犯越境誤被殺戮向中國交涉。黑龍江將軍竟代為追究，將行兇的五人治罪。同時木氏又派海軍艦長聶維爾斯哥葉（Nevilskoi）從堪察克往南去調查黑龍江口及庫頁島。聶氏發現庫頁實系一島，與大陸隔一海峽，可通航——證明前人的調查不確。他於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入黑龍江，並在其下流立二鎮所尼可賴富斯克（NicoLaievsk）及馬隆斯克（Mariinsk），即我國舊籍的闊吞屯。

木氏於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佔據黑龍江全北岸。在俄國外交史上，木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為英國企圖稱霸北太平洋東西兩岸，如俄國落後，黑龍江必為英國所占，中國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豐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國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氏的思想：

「敝國聞得有外國船隻屢次到黑龍江岸，想此船來意必有別情，且此幫船內尚有兵船。我們既系和好，有此緊要事件，即當行知貴國。設若有人將黑龍江口岸一帶地方搶劫，本國亦非所願，黑龍江亦與俄羅斯一水可通。」

此時俄國外長聶索洛得（NesseLrode）以為近東問題緊急，不宜在遠東與中國起釁，力阻木氏的計劃。尼古拉一世採取了折衷的辦法，黑龍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兩個鎮所亦不撤棄。俄國實已違約而侵佔黑龍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議，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豐三年，俄國尚無侵佔黑龍江全北岸的計劃和行動。是年俄國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國派員與木氏協立界碑及劃分無界之近海一帶。此文明認「自額爾必齊河之東山後邊系俄羅斯地方，山之南邊系大清國地方」。我國經理藩院及黑龍江將軍計議後，允許派員協同立碑劃界，並未疑此中別有野心。

不幸這時近東問題竟引起戰爭。一八五三年，俄國對土耳其宣戰。次年，英、法聯軍以助土耳其。這個所謂克裡蒙戰爭（Crimean War）不但未牽制俄國在遠東的行動，反供給木裡裴嶽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實。我們不是說，倘西方無克裡蒙戰爭，俄國就不會侵佔東北的邊境。細讀過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國在遠東之圖往南發展是積勢使然。我們不過要指出，克裡蒙戰爭促進了木氏的計劃。是時俄國在堪察克的彼得洛甫羅甫斯克（Petrovsk）已設軍港，並駐有小艦隊，英、法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擾害海上商業計，勢必派遣艦隊來攻：近東戰爭居然波及遠東！俄國為應付起見，以為惟假道黑龍江方足濟事。這舉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須不認法律」。木氏在伊爾庫次克及尼布楚積極的預備了軍需、船隻及隊伍。咸豐四年春，他遂率領全隊闖入黑龍江。

木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書庫倫辦事大臣，聲明他要派專差送緊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爾濟以與向例不符，不允所請。其實木氏知道北京必不許其假道，與其費時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實。但假道的請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豐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從石勒喀河起程，帶汽船一隻，木船五十只，木筏數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璦琿。他在此地所見的中國軍備有船三十五隻，兵約一千，大半背上負著弓箭，少數帶著鳥槍，少數手持木矛，全隊還有舊炮數尊。「二百年來，中國絕無進步」：這是當時俄人的感想。我們地方官吏如何應付呢？吉林將軍景淳的奏報說：

「查東省兵丁軍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爭端，止向好言道達。小船扯篷，胡遜布欲待始終阻攔，恐傷和睦，會派妥員尾隨偵探。」

盛京將軍英隆及黑龍江將軍奕格會銜的奏摺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應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達，尾隨偵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復相同，諭旨說：

「該將軍惟當密為防範，豈可先事張惶。……即著嚴為佈置，不可稍動聲色，致啟該國之疑，……如果該國船隻經過地方，實無擾害要求情事，亦不值與之為難也。」

在東邊海防緊急的時候，木氏正怕中國與之為難。所以他教北京俄國教堂的主教巴拉第（Palladius）上書與理藩院，代為解釋。從這書中可以看出木氏要給中國什麼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系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國之界，亦實於中國有裨。……如將來中國有甚為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

原來俄國此舉是友誼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也得著一點麻醉品，他轉告北京說：

「該夷……復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圖，所有英國情形盡已訪問。初意原不止構怨於俄客，並欲與中國人尋釁。且在廣東等處幫助逆匪，協濟火藥，甚至欲間我兩國之好。」

英國是中國的大敵，俄國是中國的至友：從咸豐到現在，這是俄人對中國始終一貫的宣傳。「昏淫」的滿清並不之信，惟對於事實的侵略無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給俄國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貴國帶領重兵乘船欲赴東海，防堵英夷，系貴國有應辦之事，自應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國黑龍江、吉林往來。」

俄國的侵略當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豐五年俄國假道的人馬三倍於四年的，此外尚有墾民五百，帶有農具牲口，永久佔據的企圖已微露了，我國疆吏仍舊「尾隨偵探」及「密為防範」。當時外交的軟弱和不抵抗主義的徹底雖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責。咸豐帝原來是主張強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責貶穆彰阿及耆英，把他們當作秦檜，而重用林則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豐帝對外之圖抵抗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當時太平天國聲勢的浩大還在現今共產軍之上，東三省的軍隊多數已調進關內。五年冬，吉林將軍景淳的奏摺把當時的形勢說得清楚極了：

「查三姓、琿春、寧古塔皆有水路與俄夷可通，距東海則各以數千里計，其間惟松花江兩岸有赫哲、費雅哈人等久居，餘到曠邈無涯，並有人跡不到者，控制誠難。……尋思該夷自康熙年間平定以來，曆守藩服。今忽有此舉動，陽請分界，陰圖侵疆；以防堵英夷為名，俾可諂意往來。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當多故之秋，又乏禦侮之力，此中操縱，允宜權量。各處旱道原多重山疊嶂，彼誠無所施其技，水路則節節可通。又就人力論之：黑龍江存兵固多，病在無糧，吉林既無糧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論之：此對皆知自守，誰敢啟釁？……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四次徵調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

姓、琿春、寧古塔刻下為至要之區，三處僅止共存兵八百餘名。雖令各該處挑選閒散，團練鄉勇，究之為數無幾。到城駐守，行資生費，無款可籌。」

抵抗雖不可能，我國當時的外交還有一條路可試，就是根據咸豐三年俄國的來文與俄國趁早立碑分界，時人亦以此路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協領富呢揚阿為交涉員。四年五月，木裡裴嶽幅超過三姓之後，富呢揚阿就去追他。行到闊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氏已到東海去打英國人。富呢揚阿見該處軍備甚盛，而其赫哲引導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於是吉林、黑龍江及庫倫的疆吏決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會齊前往與木氏交涉。因時期及地點未預先約好，三處所派的交涉員東奔西跑，於八月內始在闊吞屯找著木氏。初十、十一、十二，木氏稱病不見。二十三日，木氏要求將黑龍江左岸劃歸俄國。我方代表以其要求與舊約不符，且「黑龍江，松花江左邊有奇林、鄂倫春、赫哲、庫頁、費雅哈人等系為我朝貢進貂皮之人，業已居住年久」，就當面拒絕。木氏給了他們一封公文以便覆命，交涉就完了。原來咸豐五年東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豐三年，俄國尚無重兵在黑龍江一帶，俄國尚不明東北的虛實，俄國政府尚不願聽木氏一意進行；到了五年，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國尚要求根據條約來立碑分界，五年則要求根本廢《尼布楚條約》。不過在五年，木氏尚未佈置妥貼，實不願急與我方交涉。

克裡米戰役於一八五六年結束。俄國在一八五四及一八五五年不但擊退了英、法艦隊來犯東邊海岸者，且在黑龍江下流立了兩個重鎮。等到戰爭一停，俄國在黑龍江的行動就變更性質：以先注重運軍，現在則注重移殖農民；以先注重下流，現在則注重中流。呼瑪爾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佔領，均設有鎮市。一八五七年，俄國想派海軍大

將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進北京，中國不允，因為以往俄人只准由庫倫、張家口進京。是年初，木裡裴嶽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給他全權及充分接濟去強迫中國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請。一八五八年春（咸豐八年），木氏回到黑龍江，帶有大部隊，準備與中國作最後決算。

是時黑龍江將軍是宗室奕山。在鴉片戰爭的時候，他曾充「靖逆將軍」，帶大兵到廣州去「討伐英逆」。英國兵打到廣州城下的時候，他出了六百萬元「贖城」的錢，並允將軍隊退去廣州城北六十裡。但在他的奏摺裡，他反說是英人求利。木裡裴岳幅把奕山當作勁敵，未免過於重視他了。

奕山於咸豐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齊齊哈爾抵瑯瑯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統吉拉明阿去催開議。木氏故意刁難，說他如何匆忙，無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開議，初十日，木氏帶通事施沙木勒幅（I. Shishmaref）及隨員上岸進城。木氏要求中、俄疆界應改為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兩江的航行權屬於中、俄兩國，他國船隻不准行走；江左舊有居民率遷江右，遷移的費用由俄國出；在通商口岸，俄國應與各國享同等權利，黑龍江亦應照海口例辦理。奕山答以界線應照舊，即額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山脈；至於通商，黑龍江地方貧寒，通商無利，且通商易引起爭執。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複進城交涉。他帶來滿文及俄文的約稿，其內容與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惟江左舊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爾錦屯（Hormoldzin），可不遷移。經過若干辯論之後，木氏留下約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領愛紳泰把約稿送還，以表不接受的意思。木氏又送來，奕山又教愛紳泰帶約稿去，聲明須刪去「以黑龍江、松花江為界」一句。木氏把約稿留下，「聲言以河為界字樣斷不能刪改，其餘別事明日進城再議」。

等了兩天，木氏全無動靜。十四日，他又帶原稿進城，要求奕山簽字。奕山拒絕了，且加上一層理由，謂烏蘇里河系屬吉林將軍所轄，他

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舉止倡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語，將夷文收起，不辭而起」。咸豐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璦琿交涉的大關鍵，奕山的奏摺說：

「先是木酋未來之前，有夷船五隻，夷人數百名，軍械俱全，順流而下，行數十裡停泊。木酋來時，隨有大船二隻，夷人二三百名，槍炮軍械俱全，泊於江之東岸，尚屬安靜。自木酋忿怒回船後，夜間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槍炮聲音不斷。」

飽受驚慌之後，十五日奕山就簽訂《璦琿條約》了。此約僅二款，第一款論分界，第二款論黑龍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額爾古納河；自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點起，直到黑龍江入海為止，左岸全屬俄國，右岸（南岸）則分兩段，自額爾古納河到烏蘇里江屬中國，烏蘇里以東算中、俄共管。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只許中、俄兩國船隻行走。江左自精奇里江至霍勒木爾錦屯的舊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歸大清國官員管轄」。通商一款甚簡略：「兩國所屬之人永相和好。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之人，准其彼此貿易。兩岸商人責成官員互相照看。」

《璦琿條約》的嚴重在我國外交史上簡直無可與比擬者。外興安以南、黑龍江以北完全割歸俄國；烏蘇里以東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線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口割歸中、俄共管，這是直接的損失。間接則俄國自《璦琿條約》以後，在太平洋沿岸的勢力又進一步，列強的世界帝國角逐因之更加緊急，而現在的東北問題即種根於此。且有了咸豐八年的《璦琿條約》，就不能不有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

奕山所以簽訂這約的原故是極明顯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槍炮聲音不斷」把他嚇壞了。第二，木氏為他留了塞責的餘地。江左屯戶仍歸中國管理，烏蘇里以東算中、俄共有。作到了這種田地，奕

山自己覺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責備，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瞭所失土地的潛伏價值。江左屯戶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曠地面，現無居人」。前文已經說過，東北邊境除供給皇室貂皮及人參以外，與國計民生絕未發生關係。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國家。這一年中國對俄外交所鑄的錯尚不止《璦琿條約》，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納均錯上加錯。

奕山訂約的報告及《璦琿條約》的約文於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並不加斥責，諭旨說：「奕山因恐起釁，並因與屯戶生計尚無妨礙，業已率行允許。自系從權辦理，限於時勢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諒，且他的辦理尚可實用於烏蘇里以東的地方。諭旨繼續說：「即著景淳（吉林將軍）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咸豐帝之所以承認《璦琿條約》，並不是因為他素抱不抵抗主義，也不是單獨因為奕山之「限於時勢不得已」，是因為是時中國的內政、外交全盤「限於時勢不得已」。太平天國的平定到此時尚全無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聯軍及英、美、法、俄四國通商條約的交涉。聯軍於四月初攻進大沽海口，直進天津，清廷急於北倉、楊村、通州設防，京城亦戒嚴。《璦琿條約》送到北京的時候，天津的交涉正有決裂之虞。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內地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

桂良及花沙納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離間敵人。他們知道英國最激烈，法國次之，美國及俄國又次之。法、美、俄三國亦知道只要有最惠

國待遇一條，其他都可讓英國去作惡人。桂良等如何應付美、法二國與本文無關，無須敘述；至於他們與俄國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與東北問題關係甚大，不能不詳加討論。

普提雅廷與英、美、法三國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給桂良等的照會要求二事：1割黑龍江以及烏蘇里以東與俄國，2許俄人在通商口岸有與別國同等的通商權利。他的策略則在輸灌麻醉品，以期收漁人之利。照會的一段說：

「以上兩條如不斥駁，大皇帝欽定，所有兩國爭競之事皆可消弭。俄國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滅英、佛（法）兩國，以期中國有益。……再閱貴國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敵手，自應更張。俄國情願助給器械，並派善於兵法之員前往，代為操練，庶可抵禦外國無故之擾。」

桂良等及清廷對於俄國這種意外之助是疑信參半的，但京內京外均以為最低限度應使俄國不與英、法合作，或在旁邊慫恿，所謂「助桀為虐」。關於劃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負責交涉；關於通商，他們以為已開口岸多一俄國亦無妨礙。所以他們與普提雅廷就訂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條約》。其第九款與邊界有關：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檔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有了這款，俄國便可要求劃分烏蘇里以東的地方，我國全無法拖延。這是桂良等聯絡普提雅廷代價之一。北京承認《璦琿條約》的論旨，他們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決定烏蘇里以東的土地歸俄國。桂

良等也答應了，以為這就是諭旨所說「與黑龍江一律辦理」。所以奕山在璦琿爭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實已贈送俄國，惟條約尚待訂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與英、美、法所訂的條約許了外人兩種權利與以後東北問題有關係的；一種是牛莊開通商口岸，一種是外人得入中國傳教。這兩種權利，尤其是牛莊通商，促進了東北問題的世界化。

總之，中國在咸豐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則顧不到了。在璦琿如此，在天津亦複如此。

六、俄國友誼之代價

等到英、法聯軍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過去，清廷就覺得《璦琿條約》及天津諸條約損失太大，非圖補救不可。《天津通商條約》的補救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但有一點不能不指出，因為中國要取消北京駐公使，長江開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內地的遊行，所以引起了咸豐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戰爭。有了十年的英、法聯軍，然後有中、俄的《北京條約》。換言之，因為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中國還不圖在國際團體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堅持站在國際團體之外，俄國始得著機會作進一步的侵略。

《璦琿條約》及桂良給普提雅廷的諾言之挽回當然困難極了。在東北邊境未喪失以前，我國覺得為勢所迫，不得不割讓；既割讓之後，要俄國放棄其已得權利豈不更加困難？中、俄勢力的比較及世界的大局並未因英、法聯軍的撤退就忽變為有利於我，而我方之圖取消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及內地遊行，更能使西歐與美國和東歐團結。這些國家雖是同床異夢，然我方的政策迫著她們繼續同床。咸豐九年及十年之最後努力不能不失敗，這是很自然的，這種努力的發展、方法及終止的原因是我國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劇，同時也是一幕大悲劇。

《璦琿條約》定後，朝廷原以吉林東邊空曠地方亦可照黑龍江左岸

的辦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調查地方實際情形。我方尚未調查，木裡裴嶽幅已帶領人員入烏蘇里江。疆吏關於此事之報告於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當日下的諭旨說：

「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倘該夷有心狡賴，即行嚴行拒絕。……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其所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起釁也。」

從這道諭旨，我們可以看出清廷在八年七月初已決定黑龍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圖挽回，但烏蘇里以東之地則斷不割讓。七月初的態度已與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極了。俄國既得了黑龍江左岸，更加要烏蘇里以東的地方。朝廷的態度雖變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給了木裡裴嶽幅一個諮文，說：「烏蘇里及海一帶地方應俟查明再擬安設界碑。」這明是承認中、俄可以劃分烏蘇里以東的地方。實際的劃分雖推延到查明以後，但推延不是否認，且與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時間限制的。

疆吏的調查報告於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們說烏蘇里一帶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俱系採捕參珠之地」，兩岸住有赫哲、費雅哈，「歷代捕打貂皮，皆在該處一帶山場，均屬大有關礙」；「且該處距興安嶺甚遠，地面遼闊，統無與俄夷接壤處所」。最奇怪的，他們的報告不提海山威，足證彼時海山威與東北關係之不重要。朝廷得此報告後，於二十一日下旨，說：

「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

求，著該將軍等妥為開導，諭以各處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為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為正辦。若肆意侵佔，執我參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

後三天，複有一道諭旨責備吉拉明阿：

「綏芬、烏蘇里兩處既與俄夷地界毫不毗連，且系採捕參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裡裴岳幅於冰泮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態度雖較前強硬，反於此時從吉林調兵一千駐守山海關，從黑龍江調兵一千駐守昌黎、樂亭以防英、法之再來。可見彼時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國的侵佔疆土為更重要，置急迫。

俄國為促進烏蘇里邊界之「登入檔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一面派人進京互換《中俄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並作進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裡裴嶽幅派人去測量烏蘇里區域。疆吏既不敢違旨會同查勘，又不敢擋住俄人的進行，結果木氏的委員伯多郭斯啟（Lt. Col. C. Budogoski）於九年的春夏單獨測量和繪圖。俄國的公使丕業羅福斯奇（Pierre Perofski）於八年冬抵北京，我國派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及刑部尚書瑞常與之交涉。九年三月中，批准證書互換以後，丕氏提出八項要求，其中第一項即系關於劃界的事。可惜《夷務始末》不錄來文，只錄軍機處的答詞，但從這答詞中，我們可看出朝廷態度之又一變：

「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至今相安已

百數十年。乃近年貴國有人在黑龍江附近海岸闊吞屯等處居住，該將軍念兩國和好之誼，不加驅逐，暫准居住空曠之地，已屬格外通情。今聞欲往吉林地界，該處距興安嶺甚遠，並不與貴國毗連，又非通商之處，斷不可前往，致傷和好。黑龍江交界之事，應由我國黑龍江將軍斟酌辦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礙難懸定。」

換句話說，軍機處仍認《尼布楚條約》為中、俄疆界的根據。雖未明文的否認《璦琿條約》，等於否認了。因為就是黑龍江左岸，奕山尚止「暫准」俄人居住，吉林東部更談不到了。俄國於五月裡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業幅來京交涉。伊氏在俄國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亞細亞的小邦，以能瞭解亞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肅順、瑞常二人負折衝樽俎之責。肅順是咸豐末年的權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著他可說是棋逢敵手。伊氏能強詞奪理，虛言恫嚇；肅順也能。在未敘述此劇之先，我們應說明疆吏的應付及中外大局的變遷。

咸豐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報紛紛到京，說俄人如何已進到烏蘇里江的上流，並在該處蓋房屋，築炮臺。與之理論，他們總「恃為約內有烏蘇里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共管之地一語」。五月初十的諭旨要署吉林將軍特普欽「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為直截了當」。此時北京方明瞭禍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諭旨：

「綏芬、烏蘇里河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江將軍所轄地方。上年該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辯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咎無可辭。黑龍江將軍奕山著即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辦明定議。革職留任副都統吉拉明阿著即革任，並著特普欽派員拿赴烏蘇里地方枷號示眾，以示懲儆。」

「咎無可辭」當然是對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認《璦琿條約》是出於「勢不得已」，並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於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賞罰不公，不過此舉是對外而非對內的。同日還有一道密旨給特普欽：

「特普欽接到明發諭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烏蘇里等處本非俄國接壤，又與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為此事身獲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萬難應允。前此奕山等將黑龍江左岸借給俄國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經議定之地，任意闖越，即是背約。豈有吉林地界轉以黑龍江官員言語為憑之理？……該酋見吉拉明阿獲罪已有明征，自必氣餒，而特普欽等據理措詞當亦較易。」

這種對外方法確帶了亞洲人的特性在內。同時吉拉明阿以副都統的官職而枷一號示眾於烏蘇里地方，未免於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木裡裴嶽幅對這套把戲不過付之一笑。

湊巧咸豐九年的五月，中國對英、法得了意外的勝利。自英、法聯軍離開天津以後，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擔任畿輔的海防。大沽的炮臺加料重修，海河也堵塞了，沿海均駐軍隊。惟留了北塘以便各國公使帶領少數隨員進京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英、法、美三國公使於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帶有不少的海陸軍。他們決意要由大沽口進，不由北塘進。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毀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軍大受損失，陸軍登岸者亦死傷過半。於是北京及東北疆吏對俄稍為膽壯，我們對英、法的勝利影響了對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業幅於五月初十由恰克圖起程，他到北京的時候正在大沽捷音傳到之後。六月初，他提出草約六條，要求中國承認。其中第一條有關東北：

「補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龍江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應合照是年伊雲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約之第九條：自後兩國東疆定由烏蘇里江、黑龍江兩河會處，沿烏蘇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會處，由彼處交界依松阿察河至興凱湖及琿春河，沿此河流至圖們江，依圖們江至海口之地為東界。」

伊氏要求的根據是《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璦琿條約》明載烏蘇里以東之地為兩國共管；倘根據此約來分界，應由中、俄均分，不應由俄國獨佔，更不應由俄國佔據烏蘇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約所擬。《天津條約》第九條只說兩國應分界繪圖立碑，並沒有規定劃分的方法。伊氏也覺得他的根據不充足，所以在其說明書內又引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納給普提雅廷的諮文，且加上一段宣傳麻醉品：

「本國從東至西一萬餘裡，與中國相交一百餘年，雖有大事，並未一次交鋒。若英吉利等，十餘年之間，常至爭鬥，已經交鋒三次。然逾數萬里地尚且如此，況離此相近乎！若英、佛（法）兩國往滿洲地方東岸，兵船火船來時甚易。中國海岸綿長，戰法各國皆不能敵，惟本國能辦此事。若中國與本國商定，於外國船隻未到彼處之先，先與本國諮文，將此東方屬於本國，我國能保不論何國，永不准侵佔此地，如此中國東界亦可平安。且須知我國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曠之處，於中國實無用處。且貴國使者須知，因本國官員到彼，並未見有中國管理此處官員之跡，我們業經占立數處。」

在咸豐年間，英、法雖曾攻下廣州、天津、北京，但均於和議定下退去。至於東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佔領，且未曾有此擬議。伊氏也

深知此中情形，不過故意作此謠語，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國人。這個當，軍機處是不會上的。答覆雖在法律上很難講過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國與俄國定界，自康熙年間鳴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國，所定甚為明晰。至黑龍江交界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使臣木裡裴岳幅商辦；其吉林所屬之地並不與俄國毗連，亦不必議及立界通商。貴大臣所雲恐有他國侵佔，為我國防守起見，固屬貴國美意，斷非藉此侵佔我國地方。然若有別國占踞，我國自有辦法。今已知貴國真心和好，無勞過慮。」

軍機處與伊氏有了這次文書的往來，遂由肅順、瑞常負責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會晤的時候，伊氏面請肅順閱讀桂良及花沙納所發之諮文，內附有批准《璦琿條約》的諭旨。肅順等不承認有此諭旨，但三日後又去一諮文，聲明雖有此諭旨，但與吉林東界事無關，所以伊氏帶來之稿本，「諒必因抄寫之誤」。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寫錯誤之處。本大臣懇乞貴大臣將桂良所奉諭旨原文送交與我，以便查對錯誤之處」。肅順等答以諭旨原文存大內，不便檢閱。適是時伯多郭斯奇帶烏蘇里區域的地圖來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國新繪地圖，即在北京定約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佔」？肅順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詞同樣的強硬，在乾隆時代，因俄國不講理，中國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間作過的事，此時也能再作。如俄國此次不講理，中國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吉等處」亦將不借與。「是貴國求多反少也。總之，綏芬、烏蘇里江等處是斷不能借之地。貴國不可縱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雙方話已說到盡頭，條件相差甚遠。伊氏行文軍機處，要求中國改派別人擔任交涉。軍機處告訴他說，肅順、瑞常「皆系我大皇帝親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棄，曆夏秋二季，屢次向軍機處行文，均是舊話重提，空費筆墨，軍機處亦以舊話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

照會內，加上一層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願。好像中國此時要援人民自決的原則。可惜這次人民的意志實在如何，我們無從知道。俄人在烏蘇里區域測量者均說當地的人歡迎俄人去解除他們從滿人所受的壓迫，至於軍機處所說的吉林人的反對割讓，全是北京閉門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諭旨顯露此中的實情：

「現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節屢次行文，曉諭不已。當經複以綏芬、烏蘇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許後，該處民人以中國地方不應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職，吉拉明阿枷號，並未奉旨允准；倘該國前往占踞，該處民人出來爭論，反傷和好等語：藉以措詞，以冀消其覬覦之心。如該酋伊格那提業幅將此複文知照木裡裴嶽幅，恐其向該將軍詢問，吉林人民有無同遞公呈，不願該夷在綏芬、烏蘇里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欽遵照前說，加開導，以堅其信，勿致語涉兩歧，是為至要。」

伊氏於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後通牒，限三日答覆。軍機處絲毫不退讓。照複說：

「至烏蘇里、綏芬地界，因該處軍民人等斷不相讓，屢次遞呈，現已開墾，各謀生業，萬不能讓與他人。經該將軍等將此情節據實奏明。因恐貴國之人去至，該處人等不容，必致反傷和好。中國向來辦事，皆以俯順民情為要，是以礙難允准。」

伊格那提業幅接到此文以後，宣佈交涉決裂，於四月初八離開北京。

這時，木裡裴嶽幅在烏蘇里一帶照其自定計劃進行測量、開墾、設

防。疆吏雖未抵抗，亦未與劃界定約，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時候，稍圖振作。吉林、黑龍江皆辦團練，吉林則略為解放山禁，多招參商刨夫入山，「以資兵力」。在咸豐十年的春天，兩省的奏摺都有調兵設防的報告，好像他們準備抵抗。

不幸十年的夏天，我國另起了風波，把對俄的強硬都消滅了。英、法兩國為報復大沽之仇，加添要求，並厚集兵力於遠東以圖貫徹。伊格那提業幅適於是時交涉失敗後，憤憤不平的離開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釁。他見了英、法的代表就大罵北京當局的頑固與不守信義，西洋各國應一致對付中國，並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動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的奏摺說：

「查俄國使臣忽然驟至，未審意欲何為，連日亦未來請見，當飭華商楊訪等密探。旋據報稱……今因俄酋到此，極力慫恿英、佛（法）打仗，並雲在京日久，述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者鑿。諄告普魯斯（Bruce）及布林布隆（Bourboulon），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炮臺，和議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為其所惑，主戰之意堅。」

我方知道了這種消息以後，當然設法預防。

六月初，英、法聯軍齊集於大沽口外。伊格那提業幅已先到，並帶有兵船四隻。美國公使華若翰（John E. Ward）亦帶有兩隻兵船在場。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會，詢問《中俄天津條約》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佈，並言「英、佛與中國有隙，願善為說合」。他的「說合」，軍機處明知不可靠，但當危急的時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國，所以含糊回答他說：「今貴國欲為說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尹氏頗為失望，遂轉告法國公使葛羅

（Baron Gros）由北塘進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聯軍已進天津，桂良與英、法的交涉將要完成的時候，伊氏又來文，要求中國許他進京。軍機處還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暫可不必，應俟英、佛（法）二國換約事畢，再行進京辦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經到了圓明園，預備攻安定門的時候，伊氏囑俄國教士向恭親王奕訢要求許他進京。我方依舊拒絕：「如果有意為中國不平，亦必在外代為調停，俟兩國之兵退後，即可照常來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見我方防備伊氏到什麼程度。

英、法軍隊於八月二十九日進北京，伊氏也跟進了。中國的外交到了這種山窮水盡的時候，伊氏的機會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豐帝自熱河行宮宣佈諭旨：「著恭親王等迅即飭令恒祺往見該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約，不另生枝節，即可畫押換約，以敦和好。」換言之，朝廷已決定接受英、法的條件。伊氏於九月初五致信於法國公使葛羅，說他如何在北京力勸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條件。英、法進攻的原意在強迫中國承認《天津條約》及宣大沽之恥，並不在佔據北京。英、法聯軍在北京的時候，咸豐帝已逃避熱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議不成，勢必須進兵熱河，那麼，時季已到秋末，須等來年。倘英、法壓迫太甚，清廷或將瓦解。列強在遠東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戰爭，是時英、法因為義大利的問題全盤關係已趨緊張。因為這些原故，英國公使額爾金（Lord Elgin）及法國公使葛羅均以為宜速定和議，速撤軍隊，否則夜長夢多，枝節橫生。所以他們將賠款現銀部分由二百萬兩減到一百萬兩。此中背景，恭親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權代表——當然無從知其詳，而伊格那提業幅則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條約》簽訂之後，伊格那提業幅遂向恭親王要求報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見於他們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摺：

「本日複接伊酋照會，以英、佛（法）兩國業已換約，仍以所祈之事請派大員前往商酌等語。臣等複息英、佛（法）敢於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為之慫恿。現雖和約已換，而夷兵未退，設或暗中挑釁，必致別生枝節，且該酋前次照複，有兵端不難屢興之語。該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較近，萬一釁起邊隅，尤屬不易措手。查前次該酋向崇厚等面稱，允給英、佛（法）等銀兩，尚可從緩，且可酌減，並不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處。現英、佛（法）議現銀一百萬兩，難保非該酋預探此語，有意冒撞。而此次照會內頗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測。」

是以恭親王、桂良、文祥並非覺得俄國有恩於我故必有以報之，他們不過覺得伊氏挑撥之力太大，非使其滿意不可。後英國軍隊因故退出北京稍遲數日，恭親王等更急了。他們九月二十日的奏摺說：「且英、佛（法）兩夷之來，皆屬該夷慫恿。倘或從中作祟，則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為可慮。」

伊氏所索的報酬除東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邊界及通商與邦交的權利。恭親王既以速決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條約》就議好了，十月初二日（西曆十一月十四日）簽字。這約的第一條就是規定東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約最要緊的一條。條文如下：

「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璦琿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遵照是年伊雲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逾興凱湖直到白棱

河，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江口指距不過二十里。」

這兩個條約——《中俄璦琿條約》及《中俄北京條約》——在世界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即土地割讓的紀錄。我國在咸豐八年及十年所喪失的土地，其總面積有四十萬零九百十三方英里。現今的東三省加上江蘇，比我們這兩年所喪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方英里。法、德兩國的面積，比我們這兩年所喪失的土地還少六千五百三十一方英里。俄國從我國得著這大的領土不但未費一個子彈，而從始至終口口聲聲的說俄國是中國唯一的朋友。俄國友誼的代價不能不算高了！

咸豐以後的東北可稱為半東北，殘東北，因其面積縮小了一半有餘，且因為她東邊無門戶，北邊無自然防具——她是殘缺的。所以到這種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國的內亂；第二是咸豐年間全盤外交政策的荒謬，爭所不必爭，而必爭者反不爭。比這兩個原因還重要、還基本的是在世界諸民族的競進中，我族落伍了。有了這個原由，無論有無前兩個原由，我們的大東北、全東北是不能保的。

附錄二

一、資料評敘

中文著作中尚無一種與本文範圍相同的。西文中有三部著作其範圍與本文大致相同，其中兩部均因十九世紀中年俄國在遠東發展之速有所感觸而著的。兩部均是一八六一年出版的。[1] E.R.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its Discovery, Conquest, and Colonization* (London, 1861)。著者用了不少俄國方面的材料，可借甄別似欠功夫，且不詳細注明出處。書後附有簡略史料目錄。[2] C.deSabir: *Le Eleuve Amour—Histoire, Geographie, Ethnographie* (Pari, 1861)，此書與前書的範圍完全相同。資料大致相同，兩書著者均系地理學家，兩書前半皆敘歷史，後半講地理。[3] F.A.Golder: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著者精通俄文，且專治史，他審查史料的嚴密遠在前兩個著者之上。書後附有詳細書目至為可貴。此外尚有北平燕京大學徐淑希教授之[4] *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 (New York, 1924)。此書實即一部東北外交史。西文著作論東北問題而參用中西的材料，據我所知，以此書為最早。

本文論《俄國的遠東發展》的一節不過作背景的敘述，故極簡略。欲作進一步的研究者應參看[5] G.E.MGller: *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hte*, 9vols (St.Petersburg, 1732—1764)。此書出版幾將兩百年。批評者、抄襲者、繼起者不少，但至今此書有讀的必要，因為著者所見及所用的原料實不少。[6] J.E.Fiseher: *Sibirisehc Geschichte*, 2vols, (St.Petersburg, 1768)。此書即抄襲前書者之一，不過著者深知西比利亞的歷史，在重編前人著作的時候亦有所發明和糾正。關於滿人向黑龍江的發展，至今尚無專著。《皇清開國方略》、《太祖高皇帝實錄》、《東華錄》及《盛京通志》等官書皆記有某年某月伐某部族或某部落來貢一類的事實，但對滿人的武功不免誇耀過實，且所舉地名及部落名稱間有不可考者。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收了他自己所著的[7]

《東海諸部內屬述略》及[8]《素倫諸部內屬述略》。前書述清太祖、太宗徵收牡丹江、烏蘇里江、琿春河、黑龍江下流及庫頁島各部落的事蹟；後書述同時徵收黑龍江上流各部落的事蹟。兩書皆根據咸豐以前的官書，不正確，其簡略，但有系統。

《中俄初次在東北的衝突》的主要資料即《朔方備乘》內的[9]《平定羅刹方略》。此亦官書之一，過於誇耀朝政，但其中保有幾件重要論旨及奏摺。在事的人如郎坦、薩布素諸人的傳見於《清史列傳》、《碑傳集》，《清史稿》的「列傳」類，皆無聲無色，惟[10]《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五十三之《郎坦（亦作談）傳》誠為至寶之史料。[11]吳振臣《寧古塔紀略》？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有一段紀「邏車國人造反」事，形容俄人炮火的厲害，大可補官書之偏。著者隨其父在寧古塔戍所多年，其父亦被調往征「邏車」者之一，故所記皆親歷的事

《尼布楚的交涉》的主要史料當然是張誠的日記。張誠即康熙帝所信任的傳教士之一，原名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其日記見於[12] J.B.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vols,

(LaHaye, 1736)。康熙二十七的的日記（見卷四頁一〇三至一九五）僅記路程，與外交無大關係；次年的日記（見卷四頁一九六至三〇一）記尼布楚的交涉甚詳。張誠是耶穌會的會員，不敢也不願開罪中國；同時耶穌會正求俄國許其會員假道西比利亞來華，故亦不敢開罪俄國。他及徐日升無疑的作了忠實的疏通者。不過日記言其調停之功過甚，因為雙方政府最後的訓令並沒有衝突。《八旗通志》的《郎坦傳》及《平定羅刹方略》大可補充張誠的日記。[13]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le Crand, 1689—1730 (Paris, 1912)。著者是法國的一個俄國史專家，且專攻中、俄的關係，俄國已出版的及未出版的史料，關於中、俄這時期的往來的，他曾研究過，於書後備有詳細目錄。本書第一章論尼布楚交涉，其他各章論中、俄在北

京的通商。關於尼布楚以前的交涉，我國舊籍過於簡略，且多不實。最好的史料是[14] J.F.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D.1602—1676.2Vols.*

（London, 1919）。上卷大半是著名的敘論，說明俄國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俄人入西比利亞的經過及西比利亞的地理。下卷則幾全為史料，中有曾未出版者，內包括俄人出使中國的記錄及報告（頁一三〇至一六九，一九五至二〇三，二四二至四二五）。書後有極好的目錄。[15]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記康熙二十七年代表團的行程，亦可資參考。

尼布楚以後，咸豐以前，東北的狀況除《盛京通志》及《吉林通志》外，尚有[16] 薩英額的《吉林外記》（光緒庚子年廣雅書局刊）及[17] 西清的《黑龍江外記》（出版同上）兩書的敘述。《吉林外記》述事到道光初年止，《黑龍江外記》到嘉慶末年止。因其不為體裁所拘，這二書的史料價值反在官書之上。至於十九世紀的前半，列強如何競爭太平洋的海權，我們從[18]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 in the Pacific, a century of Expansion*（New York, 1932）可窺見一斑。書後附有很詳細的目錄。

咸豐一朝，中、俄關於東北的衝突及交涉當以[19] 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為主要史料。書共八十卷四十冊，民國十九年出版。因此書的出版，在此書以前的著作均鬚根本修改。咸豐朝，我方主持中、俄交涉者——奕山、景淳、特普欽、桂毅、恭親王奕訢、文祥諸人——的文稿均於《夷務始末》初次發表。關於伊格那提業幅的挑撥，[20] Henri 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Notes et documents.*（Paris, 1906）及[21]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3vols.*（Paris, 1901）之第一冊第六章有不少的材料，可惜法國人不知伊氏的狡猾。

俄文的資料必甚多，可惜著者因為文字的困難不能利用。在未直接利用俄方資料之前，我們談不到東北外患史的最後定論。

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邊境民族考

草此文時，亟思參考人類學家的著作，以決定所謂索倫及窩集諸部的種類，於是向清華同事史祿國教授（Professor S.M. Shirokogoroff）請教並參用了他的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Commercial Press, 1929），我們參考了幾張詳細地圖並審查了許多名字。我們的結論大概如下：巴爾呼即西人所謂Bargut，是蒙古種類的；索倫即Solon；鄂倫春即Orochun，均是北通古斯種類的。達呼爾即Dahur，其語言是蒙古語言的一種，其種類是蒙古種類或通古斯種類尚待考。窩集部的「窩集」實即滿文的森林；此部支派甚多，按其風俗及區域大概是Goldi，奇勒爾即Gilak；庫葉即居庫頁島的Gilak。赫真及飛牙喀大概也是Goldi。穆倫、奇雅、瓦爾喀大概是Udehe。

三、釋「俄羅斯察罕汗」

「察罕」或「察漢」並非任何俄皇的名字，亦非Tsar的譯音。二字實即蒙古文之白色的「白」字，「察罕汗」就是「白汗」。這是當時蒙古人給俄皇的稱呼而我國抄襲之，正如蒙古人稱清朝皇帝為Bogdikhan而俄人借用之，光緒年間總理衙門曾因Bogdikhan一字向俄國提出抗議。凡此足證中、俄兩國最初的相識是以蒙古文及蒙古人為媒介的。

四、《尼布楚條約》之條文考

現今最有權威的中國條約集是海關總稅務司所出版的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2 vols.

（Shanghai）。書中所載之《尼布楚條約》有中文、法文及英文三種。其法文稿錄自張誠的日記，中文稿錄自《通商約章類纂》。按《類纂》所錄者即《平定羅刹文略》所記的界碑碑文，此碑文原用漢、滿、蒙、

俄及拉丁五種文字，但所刊的並非條約全文，不過其撮要而已；且界碑並非中、俄兩國共同設立，乃中國單獨設立，其無權威可知。舊外務部所刊的備朝條約有碑文，亦有條約全文，碑文錄自《羅刹方略》，約文系錄自《黑龍江外記》。著者西清明說（卷一頁十一）他得著條約的滿文稿，再由滿譯漢，所以中文的《尼布楚條約》僅有這《外記》所錄的。以《外記》的條文來比張誠日記的條文，不符之處頗多。原來《尼布楚條約》以拉丁文本為正本，是兩國代表所同簽字的。這拉丁文本是張誠撰稿的，日記的法文本是張誠自己所譯的，所以最有權威的是拉丁文本，其次要算日記的法文本。茲特從這法文本譯漢如下：（原文見 Du Halde, vol.IV, pp.242—244）

大皇帝欽派領侍衛、議政大臣、內大臣薩額圖，內大臣、一等會、都統、國舅佟國綱，都統郎坦，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市楚城附近會同俄國全權大臣果羅文，為要禁絕那般越界捕獵及搶掠殺人滋事的不法之徒，並要確實劃清中華及馬斯哥兩帝國的邊界，更要建立永久的和平及諒解，雙方一意的議定下列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龍江的綽爾納河（Chorra, Shorra）即滿文的烏魯木河最毗近的額爾必齊河即作為兩國的邊界，處於額爾必齊河河源之上的而且綿延至海濱的山脈亦作為兩國的邊界；從這山脈之南流到黑龍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脈峰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歸中華帝國所有；山脈之北的一切土地溪河皆歸馬斯哥帝國所有。但這山脈及烏將河之間的土地暫不劃分，等到兩國大使返國，得了決定此事的必須知識，然後或由大使、或由函割再行決定。」

此外流入黑龍江的額爾古納河也作為兩帝國的邊界：這額爾古納河

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屬中華帝國；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屬馬斯哥帝國。在眉勒爾甘河（Meritken）流入額爾古納河之處，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應遷至北岸。

第二款。馬斯哥人在雅克薩所建的城垣應盡毀滅。馬斯哥帝國的臣民在雅克薩居住的，連同他們的財物應撤回至馬斯哥王的領土。

兩國獵戶，無論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面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越界遊行，或為捕獵，成為竊盜，應即行擒拿，送交兩國邊境的巡撫或武官。該巡撫審知罪情後，應給以相當的懲處。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攜械，越界去捕獵，或搶掠，或殺地方的人民，應奏報兩國的皇帝。所有犯這類的罪的人，審明屬實，應處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戰爭，更不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條。以往所有的爭執，無論其性質如何，今以後忘記不計。

第四條。自兩國宣誓成立本永久知約之日起，兩國絕不收納對方的逋逃。如有人從一國逃到對方國去，應即擒拿送回。

第五條。馬斯哥臣民現在中國者及中國臣民現在馬斯哥國內者，概仍留如舊。

第六條。兩國之間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誼條約，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從一國到對方國，惟必須攜帶執照，證明他們是得允許而來的，他們並可完全自由交易。兩國邊境的爭執既已如此結束，再兩國之間既已成立忠誠的和平及永久的友誼，如雙方切實遵守本約明文所定的各款，以後不應發生任何爭執。

兩國大使將本約蓋印後，互換兩本。並且兩國應將此約用滿文、漢文、俄文、拉丁文刻上石碑，在邊界上樹立，以作永久紀念，俾不忘兩國間現有的諒解。